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通讯

第18期 / 2020年9月

CRIHAP Newsletter

目录

本刊所有图片版权归亚太中心所有。

本期责任编辑
沈策

亚太中心特别报道

亚太中心管理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京召开
亚太中心咨询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京召开

4

4

7

国际资讯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察
——一种紧急状态下的非遗实践形态

8

8

培训回眸

“针对蒙古媒体从业人员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履约能力建设培训”纪实
田野调查分组报告
新闻工作者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
蒙古国家广播公司参与文化遗产的记录
蒙古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对本次培训班的感受
做连接非遗与公众的桥梁
——“亚太中心”首个媒体从业者“履约”能力建设培训班侧记

12

12

20

28

34

36

45

46

亚太中心业务动态

亚太中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融合培训班”在线开班
第四期中亚师资培训班在线举办

48

49

50





会议现场。亚太中心管委会主席，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旭主持会议

亚太中心特别报道

亚太中心管理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京召开

2020年1月14日，亚太中心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召开管理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亚太中心管委会主席，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旭主持会议。亚太中心管理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研究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信息和网络中心等机构的代表共60余人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批准了亚太中心2019年度工作报告和2020年度工作计划等事项。

2019年，亚太中心先后在乌兹别克斯坦、斐济、泰国、韩国、中国、越南、孟加拉国、菲律宾、蒙古国举办了11期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培训班。

乌兹别克斯坦培训班是亚太中心继2017年和2018年分别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办两期中亚师资培训班基础上，为该地区举办的第三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俄语）培训，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2019年计划在亚太地区开展的唯一一期师资培训。

斐济培训班旨在有针对性地为太平洋地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政府文化部门官员讲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知识，培训成果文件“太平洋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展计划”将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皮亚办事处制定该地区未来五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划的重要参考资料。

泰国培训班是为泰国制定的“三年期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系列培训”的第二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泰国在国家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的不足，对《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合作机制不熟悉等问题。

韩国培训班作为亚太中心在韩国举办的第三期培训班，是基于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利益方，尤其是私人领域的相关利益方鲜有机会能够学习到以《公约》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法律规范现状，并为契合韩国从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者为中心的保护模式”转移到“围绕《公约》框架下的以社区为中心的保护模式”而形成的，进一步加强了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人员对《公约》这一国际准则的关键理念、机制、权力和义务的全面理解。

“《公约》与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融合培训班”作为连接《公约》与高等教育的第一期培训班，改变了仅有三分之一的高校在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中使用了《公约》或者能力建设方面教材的现状，培训班后，学员将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中不合理的内容。

越南培训班是越南南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人员首次接受《公约》框架下的培训，有力补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前为来自越南北部和中部学员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培训，对于提升越南整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孟加拉国培训班的筹备工作提前9个月开始启动，工作组在认真研究了孟加拉国整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的基础上，对往期培训做了梳理总结，为本期培训制定了更加合理的方案，专门设置了为具体项目制定保护措施，引导学员扮演社区角色，进行模拟练习等内容，使培训班具有连续性、深入性，取得了预期成效。

针对菲律宾成为《公约》缔约国后，急需提高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履约能力，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应菲律宾政府的请求，亚太中心在菲律宾举办了“三年期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系列培训”的第一期，意义非凡。

蒙古培训班是继2017年亚太中心为蒙古国举办针对“蒙古媒体从业人员的《公约》履约能力建设培训”之后，第二次为蒙古国举办《公约》框架下的能力建设培训，也是中心首次在异国为高校从业者举办“基于高等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培训”，为蒙古国多所高校的从业者建立起了蒙古高校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交流互动平台。

为充分总结中心成立9年来的培训成效，展望未来工作，亚太中心于2019年10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办了“回顾与展望：亚太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培训”。这是亚太中心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培训，具有“承上启下”的深远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区域办事处和国家办事处的官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培训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其他二类中心代表，以及曾经参加过和即将接受亚太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培训的来自韩国、蒙古、中国、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尼泊尔、老挝、菲律宾、巴基斯坦、斐济、汤加、乌兹别克



亚太中心秘书处作中心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斯坦 14 个国家 20 余位学员代表，对亚太中心自成立以来举办的 40 余期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培训活动和培训后续活动进行了全面回顾，并对培训班的主题、方法、组织等内容认真分析、深入讨论，为亚太中心今后发展建言献策，开出了“良方”。

虽然亚太地区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局面已经初步打开，保护体系也初具雏形。但是，亚太地区民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还亟待提升，低收入依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者和社区参与者的隐忧，国家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力和资金还很匮乏，国家立法以及社区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搜集、文献整理、数字化保护仍然薄弱。有的国家还面临政局不稳、人员流动大、本国国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不充分、传统技艺严重依赖的原材料稀缺、代际传承等问题。可以说，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各会员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依然充满挑战。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和拓展，亚太中心在本地区的可见度和影响力在日益提升，各国普遍期待，继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力量培养等方面与亚太中心合作。一些国家还向亚太中心提出了明确的培训主题需求，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紧急状态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青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性别”“国家周期报告撰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防灾减灾”“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政府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援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等教育”等。

为满足亚太地区国家不断增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需求，今后，亚太中心将继续在已举办过培训的国家“深耕”，并进一步开拓“培训版图”。

目前，亚太中心正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交流活动，并对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动态信息进行梳理和研究，及时发现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最新关注点，使培训工作“与时俱进”。同时，中心通过举办培训项目总结会、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信息通报会和主题学习会等形式，加强内部自身能力建设。2019 年，亚太中心中英文通讯已全面改版。

管理委员会高度评价亚太中心的工作，认为亚太中心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不断突破，已进入到一个成熟稳健的新的周期。亚太中心一贯遵照《公约》精神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能力建设战略工作重点，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培训活动，为亚太地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出极大贡献，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开展，协助并推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战略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期待中心今后能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职业教育、引进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实践案例等方面有更大作为。

截至目前，亚太中心已为亚太地区举办了 49 期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培训，受益国达到 40 个。9 年来，中心在东亚、南亚、中亚以及太平洋地区，围绕《公约》“履约”“履约”“基于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制定培训”“保护计划制定”“名录申报”等常规主题开展了持续有效的培训活动，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培训师讲授《公约》关键概念、清单制定工作的复杂性以及“社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等内容，向参训的各国文化事务官员、社区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者、专家学者等群体传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方法，并让“在场学员”通过后续培训和活动，将所学的内容传递给更多人群。

会后，部分与会代表前往“楚和听香”，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服饰的考察调研活动。



亚太中心咨询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全体人员合影

亚太中心咨询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京召开

2020 年 1 月 13 日，亚太中心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召开咨询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由咨委会主席，原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合局局长张爱平主持，10 名委员与会。

会上，委员们对中心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赏和肯定，并主要围绕亚太中心秘书处提出的有关“培训主题”“培训效果”“田野调查”“与培训师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自身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委员们认为，中心应密切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趋势和新关注点，开发相关培训教材，并根据不同的培训主题，采取多样化的培训模式，例如，针对不同培训灵活调整《公约》与实践授课内容的比例，加强培训课程与实地教学的关联性，增加面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实操性培训活动，加强对机构的能力建设培训等，并建立先评估、后培训、再评价的培训工作流程。此外，要利用好培训举办地本地专家丰富的经验，结合受益国本地的实际情况选取培训主题，积累案例，使培训更有针对性。

委员们还对与培训师建立更加便利的沟通渠道、保持长效合作关系，利用新媒体，加大中心宣传力度，加强与其他二类中心合作，开展中心人员交流，呼吁政府部门加大对亚太中心的资金投入，增加工作人员数量，以保证中心更好地为亚太地区各国提供培训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心开展今后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国际资讯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察

——一种紧急状态下的非遗实践形态

沈策

疫情对非遗领域的影响

由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目前全球范围内正在经历的严重封锁状态还在继续。在文化产业领域，歌剧院、戏剧节、音乐厅、电影院等全球文化艺术机构受到重创，艺术展览、书展、演艺等文化活动停摆，停演、减薪、失业对相关文化艺术从业者构成不小冲击。

因隔离和限制措施，作为传统文化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活动，也同样被迫面临窘境：节日和文化活动被取消或推迟，文化习俗和仪式受到限制，给许多人的生活造成困扰；社区作为非遗实践的基本单元，已丧失了其作为文化和自然空间、记忆场所承载非遗表达的必要性；而表演艺术以及传统手工艺类的非遗传承人和从业者多因工作的自由性，收入大幅减少，有些手艺人因为订单和原材料获取渠道的中断，已经失去生计，情况不容乐观。

一种紧急状态下的非遗保护与实践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无法预料的全球蔓延，可与武装冲突、自然灾害等一样，属于一种紧急状态，在疫情严重的地区，社交距离和禁足封锁正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各国非遗实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在四旬斋（大斋期）期间，许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节日和庆祝活动受限或中断。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具有适应和进化的能力。2020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秘书处针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非遗实践发起了一项调查。截止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征集超过200个相关案例，其中，非洲地区11例、阿拉伯地区11例、亚太地区43例、欧洲和北美地区85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78例。反馈结果表明，尽管采取了隔离和限制措施，但社区、群体和个人正通过寻求创造性的表达方式适应这个特殊时期并继续实践他们的活态遗产传统。例如，从哥伦比亚到委内瑞拉，从克罗地亚到意大利，尽管形式有所调整，许多圣周庆祝活动今年仍在进行。

在2020年9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八次会议上，作为本次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来自140多个缔约国的250名代表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活态遗产的保护进行了讨论，批准了紧急情况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原则和模式（operational principles and modalities）。会议期间，举办了“坚韧艺术：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活态遗产经验实践”的主题线上对谈，集中探讨了疫情期间与从事艺术有关的非遗从业者处境恶化以及相关社会经济权利、版权保护、内容数字化等议题。意大利、马里、巴勒斯坦、秘鲁和斯里兰卡的社区成员各自对艺术实践类的非遗是如何度过疫情危机进行了经验分享。

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的克雷莫纳市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市作为“克雷莫纳传统小提琴制作工艺”（于2012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发源地，使得传统小提琴制作一直以来都是克雷莫纳公民文化身份的标识，在城市的文化习俗和仪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4年以来一直作为意大利克雷莫纳市市长的Gianluca Galimberti一直致力于克雷莫纳的传统小提琴制作工艺的宣传推广，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行政封锁导致小提琴作坊和制作车间关闭，非遗实践中断，而展示与小提琴有关的手工艺和乐器藏品的博物馆等相关文化机构的关闭，对于作为该项传统知识和技艺的守护者的克雷莫纳社区也有所影响。为应对危机的短期影响，一

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对于提升该项非遗传统保护意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虚拟会议等形式将克雷莫纳社区150名提琴制作手艺人聚集在一起是不现实的。为避免因疫情直接导致非遗从业者失业，作为该项技艺管理组织的克雷莫纳市政当局一直与小提琴手艺人联合会、克雷莫纳商会和工艺协会、克雷莫纳小提琴博物馆（Museo del Violino）以及Claudio Monteverdi音乐学院、国际小提琴制作学校等机构保持合作，甚至与学者、电视台以及Unomedia、Procremona等当地媒体合作，以确保该项技艺的存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克雷莫纳小提琴博物馆通过发放通讯及教学材料包、开设远程课程、与音乐家合作录制提琴表演视频等手段，加强了该技艺的社会连结。在复活节当日，用作为克雷莫纳城市象征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在已被废弃许久的Arvedi礼堂举办了一场独特的提琴音乐会，克雷莫纳广播一台向该市市民进行了转播，艺术效果空前震撼。可以说，疫情期间的这场音乐会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用来演奏的这把小提琴是第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十分名贵，在1961年被克雷莫纳的公共机构购买，这标志着“收藏”的开始和克雷莫纳人身份意识的觉醒。这次广播音乐会同时在YouTube上播出，作为这项非遗社区与民众的连接枢纽，博物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社区的生存环境，博物馆还实施了包括举办展示小提琴制作的在线视频展览、拍摄封锁时期日本小提琴家横山令奈（Lena Yakoyama）在克雷莫纳托拉佐山顶的演奏音乐片、拍摄同样由日本小提琴家横山令奈在克雷莫纳医院屋顶上表演的音乐片，以慰藉那些医护人员、志愿者和病人，拍摄包括著名小提琴家Edoardo Zosi和大提琴家Francesco Nocerino等与博物馆有长期合作关系的音乐家的视频包，以宣传克雷莫纳小提琴的制作传统，播放博物馆馆长及藏品保管员的采访视频，增强公众对该项工艺的知识和保护情况的了解，与谷歌艺术等文化平台合作，由博物馆主页可点击进入的“云游博物馆活动”，制作提琴制琴师传统的音乐宣传片，与克雷莫纳“安德烈·帕齐恩扎”漫画中心（Andrea Pazienza Comic Strip Centre）合作，为儿童专门创作介绍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知识的漫画书，开发包含作画、以“克雷莫纳——一座废弃之城”为主题进行短篇故事创作、设计一个剧本、创造一个漫画形象等博物馆教育项目，在社交平台发布音乐学院学生的演奏表演等许多举措。而从长期来看，因为很难确定疫情过后，有多少手工作坊能够存活下来这场危机已严重危及到该社区的经济效益。此外，由于克雷莫纳的小提琴制作是社区身份和独特历史的重要见证，危机也同样影响了该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等社会效益。为克雷莫纳传统小提琴工艺

制定保护计划以及涉及小提琴起源和地理标志的专题保护项目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前者的保护方案将作为一个典范，对意大利境内的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和东南欧国家的非遗保护具有引导作用。

而世界很多地区的活态遗产在疫情面前也面临被迫中断，亟待支援的窘况。在马里，对人们有着纪念意义和宗教价值的陶土建筑遗产杰内清真寺（the mosque of Djenné）也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这是因为，清真寺的泥瓦匠以其专门知识和技艺一直以来对清真寺进行维护和保养。受疫情影响，工匠们的工作停滞了，失去了收入来源，这项活态遗产技艺的代际传承被迫中断，现急需对这些泥瓦匠及其协会组织进行支援。

在克罗地亚，于2009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瓦尔岛的‘跟随十字架’游行”（Procession Za Krizen ('following the cross') on the island of Hvar）今年在特殊的情况下还是照常举行，以确保其500年历史传统的延续。往常游行队伍会吸引数千人参加，今年却仅限15人参加，他们分别来自世界遗产地亚德里亚海赫瓦尔岛上的文化景观史塔瑞格雷德平原（Stari Grad Plain）的6个城镇。游行已深深植根于当地社区的身份认同，不管何种情形，这项传统的延续是一种坚持。今年活动的情况让人想起1943年二战期间游行队伍的部分中断，当时该岛被意大利占领，每个城镇只有12人获准参加。

同样，于同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哥伦比亚“波帕扬的圣周游行”（Holy Week processions in Popayán）也受到了持续危机的影响。波帕扬游行是哥伦比亚自殖民时期以来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每年都吸引许多人前来。由于危机，这一活动不能以同样规模举行，但通过数字媒体确保了它的传播。

在西班牙，2018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作为天主教圣周庆祝活动组成部分的“唐布拉达鼓手演奏仪式”（Tamboradas drum-playing rituals）今年没有在街上表演。取而代之的是，位于Castile la Mancha的“Hellín圣周鼓手俱乐部协会”（Association of Drummers' Clubs of the Holy Week of Hellín）提出“呆在家里”的口号，并号召鼓手们尽可能选择从城市的窗户、阳台和露台上演奏。星期五下午5点，当父母和孩子们走上阳台，城市里同时充满了激烈的击鼓声，营造出一种情感弥漫和集体交流的氛围。

斋月是伊斯兰历的第九个月，也是全世界穆斯林一年中最神圣的月份。在此期间，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进行斋戒（马来语称为puasa），贯穿整个月，他们在日出前吃早餐，日落后吃晚餐。在新加坡，疫情以前，新加坡的穆斯林社区会到清真寺进行日常祈祷，并积

极参加斋月期间额外的“terawih”夜间祈祷。同时，穆斯林家庭和新加坡人会聚集在 Geylang Serai 和 Jalan Bussorah 的街道上，享受户外街市上各种各样的马来美食，还可以购买礼物和衣服。然而，由于疫情影响，新加坡的清真寺全部关闭，所有人被鼓励呆在家中。因此，穆斯林社区不能在清真寺一起吃早餐，也不能在斋月结束时互相拜访。鉴于上述情况，新加坡国家遗产委员会和马来文化遗产中心决定合作举办“斋月在一起”（Ramadan Together）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数字平台连接穆斯林社区，并向大众普及与斋月有关的非遗实践知识。活动为期一个月，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起伊夫塔（开斋晚宴）”，鼓励穆斯林在线上一同开斋；“一起烹饪”（Masak），分享在家制作传统 Hari Raya 的菜肴食谱；“一起音乐会”，提供本地艺术家及艺术团体的“现场”表演。为了配合新加坡国家遗产委员会提供的数字服务，马来文化遗产中心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制作一系列以社区贡献为特色的数字节目，其中包括由马来西亚知名人士制作的烹饪和烘焙教程，他们展示了开斋的家庭食谱以及传统的 Hari Raya 菜肴。此外，文化中心还录制了传统 Hari Raya 服饰的视频和动画。此外，该活动还包括号召公众提供在过去如何庆祝 Hari Raya 的内容，所提交的照片被张贴在马来文化遗产中心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创意的作品还有机会赢得奖品。为宣传和普及马来文化遗产，马来文化遗产中心还向大众提供与“斋月”相关的词汇表、进行传统的四行诗问候、分享 Hari Raya 音乐影像等。

疫情对传统表演艺术的影响很大。但是，表演艺术界正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传统表演艺术渡过危机。韩国国家古加克中心以及首尔东花门传统剧场，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通过 Naver TV 和 YouTube 直播表演。世界各地的很多古典音乐公司、剧院和舞蹈团体等都在利用先进技术，用过与观众分享舞者在工作室内练习的视频等建立联系。

直播表演为观众提供了可以在家观看节目的体验。艺术家可以与观众进行现场交谈并受到启发进行即兴表演，让观众感觉自己仿佛坐在前排。与在现场的剧院不同的是，通过使用视频技术，在线音乐会为观众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观众可以从特定的角度和距离观看舞台。直播表演也提高了观众的便利性，观众可以在家中一边欣赏节目一边享受美食，他们也可以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与其他观众分享感受。

疫情期间人们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家里，这也增加了在家庭中教授非遗的机会。从牙买加到黎巴嫩，诸如烹饪、传统手工艺等文化传统，都在封锁时期被重新“点燃”。父母使用祖辈传下来的食谱，和子女在家一起做传统食物，并在网上分享成果。

网络平台在这次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为非遗传统知识、表达方式的传播和传承提供了新的途径。在美国佐治亚州，传统宴会被搬到网上举行，电脑屏幕前摆放着传统食物和饮料，就像模拟现实版的祝酒会。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民谣歌手则通过 Facebook 组织现场表演，加强了艺术家之间的团结。

在中国，网络平台在这次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为非遗传统知识、表达方式的传承和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北京东城拥有兔爷技法、内画鼻烟壶、金马派风筝技艺、邱氏花灯的非遗传承人年龄跨度很大，但他们都选择通过自主学习和主播培训，把在线讲解非遗文化知识、录制非遗技艺网课、直播营销等搬进了直播间。经过直播，销路一下打开，手工艺品一下“秒光”，网评的反馈也非常及时。民间艺人们都感叹于这种不同于线下静态销售模式的出奇效果，表示今后还要为年轻人和小朋友开发非遗制作手工材料包和国风文创产品、现代设计产品，还要将录制的网课精心剪辑，作为今后“非遗进校园”的网络教学视频。而许多京剧、豫剧、黄梅戏等传统戏曲表演艺术家则通过直播表演收获了一大批粉丝，既传播了传统文化，又丰富了群众特殊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

作为抗疫工具的非遗以及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的建议

民俗学家玛丽贝尔·阿尔瓦雷斯在《大流行病时代的民俗生活》中这样形容特殊时期民俗学家以及民俗的重要性：“当灾难或其他对日常生活造成重大破坏的情况发生时，医务急救人员通常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人们通常不会联想到民俗学家会作何反应。然而，在这种特殊时期还能“有质量的生活”，民俗学家能够贡献一定的专业知识。正如伊朗人质危机期间绑在树上的黄丝带，柏林墙倒塌前的涂鸦，民俗学家可以敏锐察觉人类行为的微小变化，他们可以精确探知人类如何通过千奇百怪的方式和地点来寻找意义。”

尽管新冠肺炎大流行正以不同方式对活态遗产的存续造成影响，也突出了紧急状态下活态遗产的脆弱性，但同样，也可以在这段艰难的时期为非遗社区提供抱团和复兴的土壤以及创造性的语境，迫使人们重拾对于被遗忘的以非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兴趣，甚至对非遗塑造一种新的样貌形态。

虽然疫情至今，医学界还没有研发出有效的治疗药物，但非遗的许多元素正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被用以支持和加强公共卫生措施。秘鲁阿亚库乔地区的艺术家运用传统图案设计和织绣技艺制作口罩；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Moroccan Atlas Mountains）的阿玛齐格社区（Amazigh communities）则共同分享战胜疫情的相关诗句；斯里兰卡传统的提线木偶表演（Traditional string puppet performances）讲述了隔离和社会距离的故事；塞内加尔神话中的坎库朗形象（Kankurang），作为传统上秩序和正义的保障者，从晚八点至黎明，在街上巡游，执行乡村宵禁。由表演者演唱并辅以琵琶伴奏的 Chapei Dang Veng 音乐是柬埔寨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在世的演奏大师用这项非遗向公众演唱了关于洗手、社交距离以及防疫注意事项效果明显。中国的针灸等传统医药在人们的隔离生活中发挥了养生调理、身心调解的辅助疗效作用，中国公布的包含少数民族的137项国家级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各地草药传统炮制技艺和制剂方法、食物药浴睡药等保健疗法等，是民间宝贵的抗疫资源，为人们带来了福音。

疫情期间，通过新闻媒体，我们了解到这个特殊时期人类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变化。原来很重要的会议好像也没这么重要了，离婚率攀升，家庭暴力攀升，家庭教育舒适区被打破，以前必须的文化消费也不是这么必须了，工作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理想的意义好像都有些模糊。

在焦虑、同情、恐惧、无奈、愤怒等各种复杂情绪下，民俗学家给出了三个工具包，作为“智慧锦囊”，帮助人们将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转化为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的探索之旅，以平顺度过这场还看不到尽头的人类危机。总结起来，即

— 关注事情本身。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人类从日常活动中找寻意义的最简单做法之一就是将来“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我们在没有质疑其逻辑背景的情形下接受了很多事物，我们所谓的“正常”生活并不注定如此，而是发挥了我们的主观创造力。对于所做的每一件无意识的事情，我们应有机会重塑之前的惯性方式，以此在履行义务和处理各种关系中产生更多同理心和批判性思维。而疫情期间重新学习一门手艺、一个剧种、哪怕是太极拳、口技、围棋、象棋、花毽等传统体育游艺项目，都是对平时生活的突破和尝新。

— 日常生活仪式化。出生礼、成人礼、葬礼、婚礼、生育礼等仪式是生活快照的“框架”，用来标记变化，帮助人类应对过渡。仪式的普遍功能是帮助我们注意彼此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我们最关心的诸如爱情、家庭、信仰等事物。在隔离生活中，也应将普通的生活仪式化，早晨的咖啡、下午的散步可以成为现代生活简化的仪式，仪式的意义帮助我们提高劳动的价值，始终为努力带来希望。

— 建立连接点。任何一件事物都因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的连接而产生意义。疫情期间，当我们将精力集中到自我独特而个性化的小环境中时，这场危机却正在以某种方式改变一切，改变每一个人，远超病毒的影响。我们需要时间来预测准备或重新组织健康、财富、教育等日常生活的优先事项。

这场疫情危机不仅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也造成不小冲击。然而，我们应该看见，作为“社会调节和缓冲器”的非遗，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非遗实践并没有因为危机而中断或停滞，相反，人们对于非遗的需要，对于文化传统的需要，迫使非遗在这样一种紧急状态的情势下转换了实践形式，却继续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化解身体健康危机、精神文化危机的一种手段，持续为我们在建立社会连接、提供群体归属感和摆脱困境的身心慰藉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沈策，亚太中心研究室专员，助理研究员）

培训回眸

编者按：2017年9月11日至15日，“针对蒙古媒体从业人员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履约能力建设培训”在蒙古国达尔汗—乌勒省举办，这是亚太中心首次举办的专业领域主题培训，也是中心首次在蒙古国举办的培训活动。本次培训班由亚太中心与蒙古文化遗产传播与网络协会、蒙古国家记者协会共同主办，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承办，并得到了蒙古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蒙古全国委员会的重要支持。本期“培训回眸”栏目组织了七篇文章，分别从培训班纪实、分组田野调查、蒙古国新闻媒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蒙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综览、参训学员的心得体会以及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参加培训等视角，对本期培训进行全面回顾，期待能够引起更多关注与探讨。

“针对蒙古媒体从业人员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履约能力建设培训”纪实

“针对蒙古媒体从业人员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履约能力建设培训”于2017年9月11日至15日在蒙古国达尔汗—乌勒省举办。本次培训班由亚太中心与蒙古文化遗产传播与网络协会、蒙古国家记者协会共同主办，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承办，并得到了蒙古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蒙古全国委员会的重要支持。举办本次培训班旨在回应蒙古媒体从业人士在2016年于乌兰巴托举办的东北亚非遗保护区域会议上提出的诉求，同时也是亚太中心为某一专业领域量身打造专题培训的首次尝试。

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高尔拜德雷克·恩科巴特、蒙古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文化艺术政策司司长包尔得、亚太中心主任梁斌、蒙古国家记者协会主席格拉里得、蒙古文化遗产传播与网络协会执行主任巴达姆·阿拉腾苏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培训师拉胡尔·高斯瓦米和亚历山德拉·丹尼斯等出席开班式。上述嘉宾在开班致辞中强调了本次培训班的目标——加强媒体在《公约》履约方面的作用，培训非遗保护领域的媒体从业人士以及为非遗传承人与媒体从业人士的合作提供支持。

亚太中心主任梁斌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媒体在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希望学员能够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秉承《公约》精神，在公众中推广非遗保护。

“由于缺乏媒体对非遗保护的关注，蒙古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忽视了。”蒙古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文化艺术政策司司长包尔得先生在开班式上说，“本次培训班不仅能够提升公众对非遗保护的认识，也能够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培训合作。”

蒙古国家记者协会主席格拉里得表示，“本次培训班学员包括蒙古国家级和全国21个省的省级电视媒体、纸媒和网络媒体的代表。”蒙古文化遗产传播与网络协会执行主任巴达姆·阿拉腾苏和首先感谢亚太中心组织了本次培训班。他期待未来与亚太中心和蒙古其它非遗保护机构合作，在蒙古举办更加专业的培训活动。

本次培训班向学员介绍了《公约》基本概念、非遗保护基本知识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伦理原则和责任等内容。此外，学员还开展了田野调研并探访了非遗传承人。亚太中心还邀请了中国文化报记者薛帅分享了他的经历并与蒙古媒体代表就非遗保护的报道进行了探讨。

培训班第一课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培训师拉胡尔·高斯瓦米和亚历山德拉·丹尼斯讲授，内容为“本次培训班的目标和形式”。培训师指出，本次培训班主要目标是：帮助学员了解《公约》；使他们理解媒体如何支持公众意识提升和非遗保护；介绍媒体报道非遗中的道德问题；表明社区成员不仅是信息提供者也是媒体报道的积极合作者等。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基于社区的媒体报道是提高公众非遗保护意识的重要内容。因此，应致力于在社区内外制作素材，而不是从社区提取素材。基于社区的媒体将社区成员视为非遗的创造者和专家，而不简单地将他们视为信息提供者。社区参与媒体所需的非遗素材制作和报道过程是必要的。培训师还介绍了社区参与媒体非遗报道的一些国际案例。

在本堂课最后，培训还向学员们询问了对本次培训的期望。总体而言，学员希望从授课中学到将《公约》应用于媒体报道的知识以及在这方面的国际经验。

第二堂课的内容是“蒙古的非遗保护”，由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高尔拜德雷克·恩科巴特主任授课。学员从授课中了解了《蒙古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更多具体内容，特别是与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保护、登记、清单制定和推广相关的条款。此外，恩科巴特主任还介绍了保护政策、国家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个名录中列入的蒙古非遗项目、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登记与清单制定成果（截至2017年底）、未来将要实施的非遗保护行动计划等。

之后的一堂课由蒙古国家记者协会主席格拉里得授课，内容是“媒体在利用和保护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几个迫切问题”。格拉里得介绍了蒙古新闻行业的发展历程和2014年颁布实施的《蒙古文化遗产保护法》，特别是其中第49.2.3条：“通过媒体使公众了解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习俗和法律并提升他们的保护意识”。他强调的另外一个要点是，2012年议会通过

的《国家文化政策》提到对媒体开展公众启蒙活动要加强要求并“以适当和平衡的方式促进文化活动，满足人民的需求”。

蒙古媒体行业在促进非遗保护利用和意识提升方面正在逐步发生改变。多个因素催生了这一变化。首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实施的政策和开展的活动，以及蒙古政府、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积极参与。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正在根据市场需求改革自身并在网上发布内容。这带来了多个优势，如足够的媒体渠道数量、足够的信息传播机会、大量的话题等，几乎每个记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报道文化遗产。非遗保护和利用受到关注和探讨，与非遗相关的主要内容在各个层面得到理解。不过与之相比，由于财力薄弱，媒体往往忽视文化内容，记者对非遗领域不够专业以至于出现报道错误、误导、术语使用错误、未经认真调研就发布不正确的信息等等。非遗内容制作需要大量时间和费用，因此媒体报道的内容并不总是高质量的。大多数读者感兴趣的是轰动性新闻和展示，因此发布的文化内容品味较低，对适合青少年兴趣的内容制作缺乏关注，这导致了读者群的流失。

针对紧迫性问题及其解决之道，需要建立机制，将报道文化遗产的记者联合在一起，提供专业指导和监管，组织进修培训；让报道文化遗产的记者了解其它国家媒体和记者的最佳实践，营造定期报道专业非遗内容的文化氛围；对过去100多年来蒙古媒体制作的文化遗产相



关内容进行再次传播并将它们以数字化格式转存，宣传并探索相关解决方案；在政策层面有效利用新媒体和社交媒体，传播专业记者制作的文化信息内容；将非遗保护经验纳入高校课程以培训潜在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通过采取激励措施和提高声望的方式，支持记者报道非遗保护，奖励报道非遗保护的优秀记者，不应用于启蒙大众、宣传文化遗产的社会广告收费等。

上述课程结束之后，恩科巴特·格里拉得、拉胡尔·高斯瓦米和亚历山德拉·丹尼斯与学员就“蒙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议题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记者学员们提出了他们在报道文化遗产时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总体而言，学员提到他们对非遗、非遗项目和如何区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基本知识。此外，由于缺乏文化机构和非遗传承人的网络，他们无法进行专业化的文化遗产报道，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戈壁苏木贝尔省的宝利德巴特尔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习惯从本地博物馆获取信息并与该馆工作人员在报道文化遗产方面保持合作。”来自后杭爱省的乌兰特瑟赛格说到，“有必要掌握非遗和物质遗产方面的知识。就我而言，我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

取文化遗产登记数据库，而这些数据库拥有文化遗产的详细信息。我只能说，我们对遗产仅有大致的想象而已。我写过几篇文化遗产的报道，其中遇到的问题都与资金有关。我希望报道和撰写更多濒危的非遗项目。此外，我希望学习非遗记录方法。”在蒙古国家广播公司工作的巴特巴亚尔表示，“我们缺乏一个报道文化遗产的新闻记者网络体系，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此外，目前没有文化遗产方面的专业渠道。”在蒙古电视五台工作的那人其其格说到，“我们在媒体职业道德和义务框架下从事文化遗产的媒体推广和教育工作。我们总编制定了宣传非遗的进度计划。对报道文化遗产的媒体节目没有时间上的限制。”而来自苏赫巴托尔省的奥登其麦格则表示，“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针对传统和宗教。例如“Arslantai Avdar”这一电视节目。我们一直努力让非遗传承人参与到我们的媒体节目中来。和其他学员一样，我们也在经费的问题。如果能够为我们提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蒙古的博物馆以及其它文化组织的信息和联系方式，这将对我们有帮助。”

讨论之后，培训师将来自电视、报纸、广播、网络和其它媒体的学员打乱分为五组，旨在在田野调研中开

展团队工作并为他们分享媒体报道制作经验创造条件。

接下来的课程内容是“媒体在保护非遗中的作用”。通过授课，学员学习了关于《公约》条款、范围、构成和缔约国的知识；《公约》在保护非遗方面如何发挥作用；记者和媒体组织可以为非遗保护做出什么贡献。此外，学员还了解了《蒙古文化遗产保护法》，媒体在非遗推广、传播和保护方面的作用等内容。有学员表示，“总体而言，我们知道文化遗产是什么，但是不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是哪些人、《公约》是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培训师和蒙古文化机构的负责人能够就非遗保护给我们授课，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你们的授课拓展了我们的知识，使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文化领域，特别是非遗领域。”

第二天，拉胡尔·高斯瓦米首先围绕“非遗与可持续发展：非遗与发展、环境和经济”的内容进行授课。脱离了文化（特别是文化遗产）去理解可持续发展和规划可持续发展政策，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世代传承下来的传统知识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拉胡尔·高斯瓦米介绍了印度的传统打井知识以及如何将这些传统知识与村民的日常生活

和村庄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可持续发展规划是通过政策和传统知识的传承传播形成的，例如关于环境、医学、畜牧业、自然和水资源的传统知识等。针对非遗传承人的支持政策是可持续发展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接下来的一堂课由亚历山德拉·丹尼斯讲授，内容是“自主、事先和知情同意”。她介绍了为什么非遗传承人自主、事先和知情同意是必要的，如何将这一同意与《公约》的实施机制联系起来，这一同意如何保护非遗传承人的知识；清单制定、记录和对自主、事先和知情同意的使用；将给予哪些人自主、事先和知情同意；如何取得非遗传承人的信任从而获取这一同意，是否有必要签订协议，如何提供透明性等。大多数非遗项目由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传统知识构成，但是并未受到版权法律的保护。尽管《公约》认可并支持社区对文化和非遗的所有权，但是几乎没有国家规定社区应享有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涉及的是与缔约国的关系，而不是与社区的关系。自主、事先和知情同意为社区提供了一种手段，增强了那些希望在其传统的利用、开发和应用中享有权利的社区的意识，是针对世界居民权利



的一种新出现的标准。

这之后的一堂课继续由亚历山德拉·丹尼斯讲授，内容是“道德和责任”。其要点包括：明确术语；非遗保护的伦理原则；认识不同行为主体的角色以及他们需要考虑的不同道德问题；关键道德问题、为合乎道德的非遗记录方式所提供的实用技巧；制定具体非遗保护道德准则所依据的原则；社区应在其非遗保护中发挥主要作用；社区为确保其非遗延续性而享有的权利应得到认可；在国家与社区的互动交流中应体现对非遗的尊重；与社区的所有互动交流均应是透明的并遵循“自主、事先、持续和知情同意”这一理念；应确保社区获得表现其非遗所需的物品、空间和地点；社区应评估其非遗的价值；创造非遗的社区应从其非遗物质和精神利益的保护中受益；非遗的动态和活态性质应得到尊重；社区应评估各种行为对其非遗和社区的影响；社区应确定非遗面临的威胁并决定如何防止或降低这些威胁；文化多样性应得到充分尊重；应通过与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开展非遗保护。

下午的讲座由中国文化报记者薛帅讲授。蒙古的记者学员从所播放的纪录片和幻灯片中学习到了中国记者在非遗报道和媒体制作方面的案例。此外，薛帅还介绍了在非遗报道和媒体制作中所遵循的原则和道德准则，中国记者和文化机构开展的非遗保护合作，报道非遗时要考虑的具体特点，以及非遗媒体的类型。

讲座之后，培训师和学员针对中国记者的案例进行了讨论。最后，培训师向学员提出了指导要求：学员在田野调研中应注意关注的内容和搜集的信息，例如探访、

摸清非遗项目及其名称、与非遗传承人相关的所有必要数据、非遗项目影音记录等。这之后，参训学员被分成5个小组，5个小组就蒙古家畜治疗传统知识、哈萨克族毛毡缝制技艺、蒙古传统刺绣、奶制品制作传统技艺、传统制药方法5个项目随机抽取了他们要做田野调研汇报的非遗项目。田野调研活动由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和达尔汗乌勒省教育文化厅事先组织安排。

第三天，在田野调研开始之前，部分学员总结了第二天的培训活动，分享了他们所学的经验：“我们将昨天的培训内容总结为3点。首先，正如培训师拉胡尔·高斯瓦米所述和指出的，传统知识和非遗项目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可用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应来源于社区居民参与的真实生活经历和实践，而不是政策制定者的闭门造车。其次，培训师亚历山德拉·丹尼斯所强调的“自主、事先和知情同意”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这为非遗传承人、《公约》和其它非遗保护参与方之间提供了工作机制。最后，记者在非遗报道和媒体制作时需要考虑的道德准则和责任。”

为了再次强调关于《公约》的理论知识，学员们深入达尔汗乌勒省的牧民家庭开展田野调研。亚太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培训师、亚太中心培训项目协调员分别参与了各组的田野调研。田野调研根据培训师事先的指导要求开展，各组在其探访、拍摄和记录活动中均遵守这一指导要求。

5组学员分别抽选了一个非遗项目（或是项目的构成元素之一，因为蒙古大多数传统生活方式和自然利用方式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实践内容和应用知识所构成

的），规划了他们的调研活动，准备了采访问题，在田野调研中重点关注信息采集。

那些有着多年报道蒙古农村地区经验的记者学员需要验证其已掌握的知识并对近年来发生的变化、进展和影响给予特别关注。

在田野调研期间，记者学员们对非遗项目进行了记录并与传承人进行了访谈。作为一天田野调查的成果，每组都搜集了与他们调研领域相关的数据并形成了报告和短文。

第四天，根据进度安排，部分学员就第3天培训活动提交了报告并与其他学员分享了他们的意见。在田野调研搜集的数据基础上，特别是通过访谈、录像和图片搜集的数据，各组向培训师介绍了他们田野调研的收获并就调研展开了讨论。

在分组介绍田野调研之后，培训师和学员对各组的调研发表了意见并对他们的观察进行了讨论。如，保尔得巴特尔认为，传承人正在成为非遗项目发生改变的原因之一，正如酸马奶传统制作方法这个案例所体现的一样，基于他所掌握的酸马奶制作知识和经验，他对这一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在田野调研中，他观察到，牧民家庭没有使用和遵循传统的酸马奶制作规定。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就这一问题，培训师、学员和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的非遗专家讨论并指出，酸马奶制作的传统知识在各地可以是不同的而且与酸马奶制作相关的那些仪式也是各有不同的。

在发表意见和开展讨论之后，培训师要求学员就如何提高媒体在《公约》履约中的作用提出建议。

蒙古人口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这一变化的速度在过去两年明显加快（这一点已被人口普查和统计研究结果所证实）。在此背景下，本次培训班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非遗项目如何生存？以什么方式传承？在考虑发展问题时，需要做出哪些努力确保非遗在蒙古被人们所理解？我们在培训期间所做的工作将有助于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培训的对象是来自蒙古全国各地的新闻和媒体人士。

“发展”在蒙古到底意味着什么？发展有哪些表现形式？在蒙古这个游牧历史悠久、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蓝天白云闻名的国度，发展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五天的培训和实地考察对这些问题以及其它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不过，涉及对非遗的理解和保护问题，还需未来在蒙古开展认真和持续的研究与实践。

列入蒙古《国家文化遗产登记和信息数据库》的177个非遗项目和7800位非遗传承人，或许是蒙古国针对发展、经济、环境、文化、传承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开展详尽探索和探讨时，所能够依赖的唯一资源。最好的情况是，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他们的报道和评论，为蒙古社会点亮指引前进方向的一盏明灯。

之后，培训师和学员对各组的调研发表了意见并对他们的观察进行了讨论。培训师还要求学员就如何提高媒体在《公约》履约中的作用提出建议。学员们向蒙古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是：将非遗纳入学龄前课程设置、中学课程设置并提供专业内容，例如，为儿童创作体现传统生活方式、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卡通作品，向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介绍不同的民族人物（英雄）等；将非遗相关



课程纳入不同级别和类型的大学课程设置，例如，将非遗纳入传媒专业高校的课程；政府向非遗传承人提供具体政策支持，如组织非遗传承人大会、宣传非遗传承人并为他们提供理论和实践知识等）；推动并加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对非遗保护的参与，如政府为非遗保护的稳步推进提供支持，加强地方政府领导、文化部门官员与媒体记者之间的合作，提高他们对非遗的认识，提高地方对非遗保护的积极性，为社会和政府提供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相关的经济效益方面的信息并取得社会和政府的支持；对媒体制作文化遗产相关内容制定标准和设定范本；组织媒体记者和非遗传承人共同参加的研讨会，向公众传播媒体制作内容；建立非遗保护和推广的国家数据库，在各省电视台播放蒙古国家广播电视台档案库保存的非遗电视节目和纪录片；鼓励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在各类非遗研究活动中开展合作，如游牧文化变迁、地方特色研究等；明确蒙古的国际组织、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环境和旅游部、财政部、人权委员会、性别平等委员会、国家文化遗产中心、地方政府、省级议会和媒体组织在非遗保护方面的职责，加强和支持他们之间的合作；对蒙古全国的专业记者提供非遗保护的培训和教育，支持记者参加能力建设培训班，邀请外国专家授课；与国际媒体专家联合制作非遗研究电视节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的支持下，为在蒙古和外国播放蒙古专业媒体制作的非遗电视节目建立一套综合体系；举办媒体节目制作有奖竞赛。评选年度最佳媒体节目；为记者提供资金支持等。

同时，学员们向媒体领域提出的建议是：媒体组织必须提高对《公约》的认识；宣传传承人并制作媒体节目；媒体从业者必须掌握足够和正确的知识；在开展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活动的框架下，呼吁媒体组织制作专业的非遗内容并向公众传播；与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合作，发表出版关注非遗的记者、专业研究人员以及文化学者撰写的文章著作；成立专业记者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创建媒体记者网络；鼓励青年一代的参与；组织有奖新闻比赛；宣传报道地方组织的非遗活动和倡议行动；宣传报道列入国家非遗名目的 85 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非遗宣传过程中，媒体记者必须将他们的媒体工作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相结合；媒体组织必须与科学研究机构合作并分享信息。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培训师亚历山德拉·丹尼斯则从培训角度提出了要为媒体记者写作、报道和制作关于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媒体创作提供培训；支持年轻人参与非遗保护，为青年一代报道和记录非遗提供培训；每年定期组织国家级和地方的非遗新闻有奖竞赛等建议。

培训班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闭班式和证书颁发仪式。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主任恩科巴特、亚太中心主任梁斌和蒙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秘书长乌雅恩噶在闭班式上致辞，乌雅恩噶感谢亚太中心对本次培训班的全力支持。

举办本次培训班旨在回应蒙古媒体从业人士在 2016 年于乌兰巴托举办的东北亚非遗保护区域会议上提出的诉求，同时也是亚太中心为某一专业领域量身打造专题培训的首次尝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蒙古全委会秘书长乌雅恩噶感谢亚太中心对本次培训班的全力支持。

本次培训班在文化组织与媒体机构合作保护非遗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通过培训师的讲座和介绍，学员们认识到了他们在非遗保护和《公约》履约方面的作用；掌握了《公约》相关知识，《公约》原则，媒体在报道非遗时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应履行的责任，如何将非遗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在写作、报道和制作非遗媒体内容时应从《公约》角度考虑哪些因素等。而举办本次培训班之前，蒙古很少有记者能够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领域。

作为本次培训班的成果之一，参加本次培训班的 40 名学员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网络并迈出了文化遗产新闻工作的第一步，特别是非遗新闻工作。培训评估结果数据和图表显示，所有学员对培训班评价积极，赞赏有加。这也体现出他们在培训中所表现出的积极参与和对知识的掌握。此外，学员建议未来再举办主题为“关于非遗保护计划制定和实施的利益相关者网络与合作”的培训班。

(沈策 整理)

田野调查分组报告

在田野调查期间，参加培训的蒙古新闻媒体从业者积极为他们所属的调研小组的非遗项目进行记录，与非遗传人进行深入访谈。整个调研过程结束后，每个小组都收集到了和他们专业领域相关的项目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调研报告、撰写了几篇小文。以下是各组田野调研的总结。内容基本包含了对传承人（及其家庭）和他们生活工作情况的介绍以及对被访谈人员的直接观察和反馈。

第1组 家畜治疗传统知识

巴勒甘·图道伊和他的家人住在达尔汗乌勒省鄂尔浑县的白湖附近，乌古乌穆尔山的高洁色彩倒映在湖面上。距离白湖10公里还有两个湖泊，它们通过地下水与白湖相连。不过，1996年在白湖附近铺设了一条沥青公路，自那时起，湖里的水就开始减少。由于载重货车频繁使用这条公路，对当地土壤造成了压力，地基下沉，从而阻挡了地下水的流动。马是蒙古人的幸运象征。虽然这次我们探访的时间是在秋季，但我们了解到，过去仅在春季用这一方法治疗病马的蒙古传统似乎正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生活方式的发展而发生改变：人们正在使用摩托车而不是马来放牧，马文化正在面临消亡的危险。此前，驯马师都是让他们的马匹走着去参加那达慕大会，不过现在他们都用拖拉机和大型货车运载马匹。马的主人说，这些马匹由于接种疫苗，在马厩圈养并通过车辆运载等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被惯坏了，这严重影响了马的健康，血液在马腿中堵塞。为了促进血液循环并将毒素排出，需要对马匹进行针灸治疗。

我们到达的时候，巴勒甘正在用一把小刀给一匹马针灸。巴勒甘把他为马匹治疗的小刀视为珍贵的工具，保存在特制的小袋中。这把小刀是达木丁巴扎尔先生用制作铁轨的钢材打制的，巴勒甘30年来一直用这把刀给马匹治疗。这匹马被捆束着，鲜血从它的肩胛流出，它几乎痛苦地无法站立，看到这一幕实在令人同情。我们聚在马的周围，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饶有兴趣。马匹针灸是蒙古的一个濒危非遗项目。通过对患有搏动性疼痛的病马观察，我们了解到，马匹针灸术通过促进血液流动的方法使得病马能够得到有效治愈，接受治疗的马匹6个月内不能参加赛马比赛，不能在河湖中洗澡，夜间也不能在潮湿的环境中被看养，否则，治疗效果会很差。

赛马活动对蒙古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用于比赛的病马得到治愈，对于促进赛马活动具有积极意义。一般来说，蒙古人对于他们往上数九代长辈（包括父母、祖父母和更早的祖辈）的情况都是有所熟悉的。巴勒甘从祖辈那里学到了这项在蒙古许多省份都已失传的马匹针灸术，因此，该省的许多马匹都被带到他这里治疗，新贵一代的政客们还会购买赛马让他训练。现在，由于静脉注射、饲料喂养过多以及赛马活动的定期举办等原因，赛马常常患病，导致巴勒甘过去仅在春季用这一方法治疗病马的马匹针灸术现在在各个季节都在做，巴勒甘会接收一岁的小马驹作为治疗费用。通过对病马的血



液颜色进行观察，巴勒甘能看出毒素对马匹健康的影响，过去他还用湖里的黏土为马腿消肿。巴勒甘被蒙古国认定为85位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人之一，同时，他也是鄂尔浑县12个非遗项目的24位传承人之一。我们问他关于传承的问题，他说他正在做这件事。巴勒甘说，“我们山谷地区有一些年轻人想学习马匹针灸术，因为这是秘传知识，他们都没有传承渠道，加上能够通过对病马静脉问题的观察进行诊断需要很强的学习能力，所以学习这门知识对他们来说很困难，这就导致这一知识在年轻一代中几乎已经失传。”马的髌骨有8条静脉。当你摁压静脉时，如果它有问题，就会发热。”巴勒甘说，他让我们也尝试这个动作，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思的经历和全新的知识。他的父亲从事牲畜饲养30多年，巴勒甘从他父亲那里习得放牧、驯马和医马的知识，他还有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而他正将这些知识传承给了他的儿子巴嘎班迪，他的大女儿也是一位传统医师。

第2组 哈萨克族传统民间舞蹈和毛毡缝制技艺

达万尼生活在达尔汗乌勒省，哈萨克族居民达万尼从父亲那里习得了哈萨克族传统舞蹈“Qara Jorga”（蒙古境内有16万哈萨克族居民）。在冬不拉旋律的伴奏下（冬不拉是哈萨克族的民族乐器），这个健壮的男子认真地左右舞动简单的步伐，上肢在空中上下舞动。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让我们感受到冬不拉旋律与舞蹈的融合，就像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紧密关系一样。达万尼身着从父亲那里传承来的哈萨克族传统男子服饰，服饰图案多彩美观，饰有银边的猎人帽和系脚带。哈萨克族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依然延续驯鹰术的民族之一，他们的传统技艺和知识以“驯鹰术：人类的活态遗产”这一名称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这些绣在哈萨克族传统舞蹈服装上的图案和装饰表现的是有着250年历史、至今依然存在于他们生活之中的猎鹰术。其中，对鹰隼的模仿出现在了哈萨克族的传统舞蹈之中。除了他的舞蹈服饰，达万尼的妻子拉比嘎还用这种绣制技艺制作了家里的所有挂毯并缝制了地毯。达万尼家里的陈设，特别是他妻子制作的绣有传统图案和装饰的挂毯、床帷和枕套，让我们仿佛进入了一座“家庭博物馆”。踩在他妻子拉比嘎绣制的绚丽多彩的毛毡地毯上令人不忍，不过她妻子很随和，对我们说“别客气”并邀请我们坐在蒙古包的北侧。和哈萨克族其他女性一样，拉比嘎在八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学习缝纫。按照哈萨克族的传统，父母应为子女结婚缝制带有图案的毛毡用品。他们的手工艺品，特别是毛毡用品，设计制作精良，持久耐用。虽然缝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是这些毛毡用品至少能够用60至70年。

缝制毛毡地毯的第一步是剪羊毛。之后，牧民会清洗羊毛并将一层层羊毛纺成毛毡。毛毡是环保产品，人体不会对它产生任何不良反应。蒙古的毛毡尤其暖和舒适，有利于人体健康。人们用毛毡地毯和毛毡用品可以有效防止背痛和肾病。而缝制毛毡地毯，哈萨克族人会在事先准备好的毛毡上缝出绚烂的图案。考古发掘曾发现2500年前匈奴时期的缝制地毯，这证明蒙古人在古代就习惯使用毛毡。此外，他们还会用毛毡缝制传统风格的帽子、靴子和袜子。



拉比嘎说，现在人们都在使用工厂生产的成品毛毡，这是传统毛毡制作技艺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她担心传统手工毛毡制品的衰落会让人们忘记祖辈的传统知识和古老的非遗技艺。我们采访到的传承人说，“工厂生产的成品毛毡正在危及我们的传统实践。”自从采矿活动在当地开展以来，哈萨克族人纷纷进入采矿业工作，令这项传统行业的局面雪上加霜。但是，我们了解到，牧民家庭正在着力保存和传承传统非遗知识和技艺。拉比嘎从她婆婆比利姆和她丈夫的姊妹那里学会了缝制毛毡制品，包括毛毡地毯、挂毯和床罩等。达万尼则从他父亲马古亚那里学习了哈萨克传统舞蹈、冬不拉和猎鹰术。夫妻俩说，他们将沿着父辈的足迹把所继承的知识传给他们的孩子。作为民间艺术家和杰出的文化工作者，达万尼正在向邻居们的10多个孩子传授他的知识，分享他的经验。他已接受洪格尔县当地政府的请求，向其他人教授哈萨克族传统民间舞蹈的知识和经验。当地政府则给他提供场所、设备以及一定金额的报酬。拉比嘎却说，她会教女儿们学习这项非遗技艺，哈萨克族毛毡缝制技艺不能轻易消失。我们还欣喜地在这些牧民家庭看到了其它蒙古非遗项目的传承，例如传统奶制品制作、传统服饰制作、传统家庭用品制作以及传统刺绣工艺等。

几百年来，传统文化一直是哈萨克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牧民达万尼的家庭向我们展示了蒙古的哈萨克族依然在纯粹地承载着他们的文化和传统。

第3组 传统蒙古刺绣-3D 刺绣

刺绣不仅体现了服饰和其它物品的美感和时尚，而且也延长了它们的使用寿命。蒙古有四五十种刺绣类型，它们在当地方言中被称为 oroomol、erkheemel、erkheeleg 等。蒙古人的刺绣可从各种角度欣赏，仿佛是突出鼓起的，因为一针就能绣出三个线条，清晰地呈现出色彩变化，仿佛呈现一种3D效果。在各种蒙古传统刺绣类型中，环针绣 (zuo orookh) 对技艺的要求最高。绣工在仔细挑选出三五种颜色的绣线后，通过环针绣的技法，用交织的绣线绣出同样数量的线条，这样就形成一个一个小的环状图案。在对匈奴墓葬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物品上绣有单针和双针的环针绣图案。蒙古包特有的挂毯也得益于这些刺绣技艺的创造。达尔汗乌勒省的绣工 Tsengelsaikhan Zadi 和 Amarbayasgalan Davaasambu 是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他们制作了大量刺绣作品并致力于这项技艺的传承和推广。绣工 Tsengelsaikhan 在 2005 年联合国举办的“如何将传统刺绣变为现代大众产品”这一比赛中获奖。从那时起，她就致力于向他人传授刺绣技艺、制作绣品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她向我们讲述：“当早期人类开始生火做饭时，为了

保护他们的手掌不被烧热的棍子烫着，他们用动物毛皮包裹，这就产生了把手和环子，这就是蒙古刺绣的灵感来源。”

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某些特定时期，手工绣品被认为是过时的，几乎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随着蒙古人对自身文化遗产和传统的重新认知，传统手工艺得到了振兴，手绣的鼻烟袋、帽子和靴子已成为蒙古名贵的消费品。例如，用环针绣技艺绣出一个鼻烟袋需要6个月的时间，价格高达1百万图格里克，绣工还会崇拜并制作佛祖形象，以求保佑。同时，在国际场合穿着蒙古传统服饰被视为尊贵和最高敬意的象征，这也带动了特定人群穿着传统服饰出席各种国际场合的潮流，激发了不少蒙古当地社区以制作传统服饰提高生活水平的兴趣。由此，蒙古传统刺绣在当代消费市场也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蒙古人把不会缝纫和刺绣的妇女叫做“不能手握针线的人”，这也表明，会缝纫和刺绣应该是蒙古妇女的基本技能。得益于家庭培训和学徒训练这样的传承模式，让Tsengelsaikhan在儿时从她姑姑那里习得了这项传统刺绣技艺。她还记得，曾用环针绣技艺绣出一个鼻烟袋，但是耗时6个月。依照传统习惯，蒙古妇女会给他们的丈夫一个鼻烟袋作为礼物，里面承载着她们的祝福和关爱。蒙古人也会在女儿10岁的时候，送给她一个手工艺人的工具盒子作为礼物。

传统而言，动物骨骼、毛发和外皮都可作为刺绣的原料。具体来说，毛毡、牛皮、加工皮革、鬃毛和马尾、牦牛毛、山羊绒、丝绸和“khadak”围巾过去都曾作为用来制作手工刺绣绣线的原材料。不过，现在的绣线原料已经很容易获得了。“硬币形缝制”这一刺绣技艺是仅在蒙古出现过并且是仅用于装饰裙边的绣法。环形针绣、鱼背绣(zagasan nuruu)和直针绣绣法则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技术所替代的。选择颜色、进行设计、绣出图案是一门秘传的知识和一笔无价的财富。同时，刺绣也是一门独立的材料研究学科。人一旦对刺绣产生兴趣，他就会不自觉地深入探究。

环针绣传承人正在致力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他们的非遗项目，并对这个项目的整理记录、品牌推广以及市场调研进行充分讨论。同时，通过电视媒体向广大观众现场教授刺绣制作过程，并在传承人居住的地区和省份开展学徒培训。这些传承人说，“我们在蒙古各种新闻网站上都发布了有关蒙古匈奴时代刺绣技艺的消息，希望引起民众关注。”

人们闲暇时可以在家里制作刺绣，开始制作一幅刺绣作品的时间要根据天象而定，制作之前还要进行祈祷仪式。不同的刺绣技艺有各自独特的名称，各种不同的

手工传统刺绣技艺不可能被机器复制。这些刺绣都是单品，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刺绣能帮助人变得专注、精准和耐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绣品的价值也在不断增长。环针绣传承人们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刺绣技艺的书籍，以帮助那些想学习传统刺绣的人们。Tsengelsaikhan高兴地告诉我们，她的男学生们技艺娴熟，学得很快并且十分具有创造力。除了培养学徒，她还撰写了一系列培训教材，向学员讲授如何学习刺绣。由Tsengelsaikhan成立并命名为“Egneshgui ukhaan”（意为“无比的智慧”）的非政府组织也正在为刺绣技艺传承和产品销售提供帮助。

尽管刺绣在社区中变得越来越流行，但是，品质低劣的绣品流入市场并玷污绣工声誉的风险依然存在，因此，这些传统手艺人呼吁要尽快制定传统手艺人等级规范，创立商标制度。

第4组 奶制品制作传统技艺

我们来到了阿嘎里嘎拉姆，这里是一个半定居的牧民聚居点。当我们正谈到这个聚居点并不是那么游牧化的时候，主人牵着狗，请我们进入他的蒙古包。这位牧民名叫敖特根图尔·巴特姆亚马尔，为了离市场更近，他在20年前举家从扎布汗省迁移到达尔汗乌勒省，现在的家庭也是半定居式的。我们注意到，蒙古包西侧墙上悬挂的皮囊袋中似乎装着秋天制作的酸马奶，发酵度正合适。由于牧民现在开始在塑料容器中发酵酸马奶，酸马奶的品质和口味下降了不少，能够看到还在用皮囊袋发酵酸马奶变得十分珍贵。同时，皮囊袋的制作技术也吸引了我们。敖特根图尔向我们说明：“皮囊袋是用8岁大的母牛或公牛的皮制成的，皮革要在湿润的状态下裁剪缝制。颈部的皮要巧妙精心地用撑杆搭起来，小腿的四块皮要用细的皮革线缝制在一起。在两块皮革之间要缝双层针线并用棉布窄条包裹，以防止酸马奶从缝隙泄露。”

蒙古的牧民家庭平均有100匹马、300只羊和20头奶牛。因为马奶制品品质优越、营养健康，可以让人们在艰苦的日子保存脂肪和保持健康，所以牧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是制作马奶制品，我们之后目睹的马奶酒蒸馏就是其中之一。敖特根图尔家制作的奶酒一般会经过三道蒸馏程序，每道程序都有一个名字，敖特根图尔的妻子哈姆将发酵的酸奶倒入大锅，然后在上部放置金属蒸馏设备，再用悬挂的壶接收奶酒并在顶部放置一口小锅。为防止蒸汽流失，她把蒸馏设备与小锅之间的接缝处包裹住并开始于炉子里烧火加热。当顶部的小锅加热适度后，液体就会流入锅中。哈姆把马奶酒壶放到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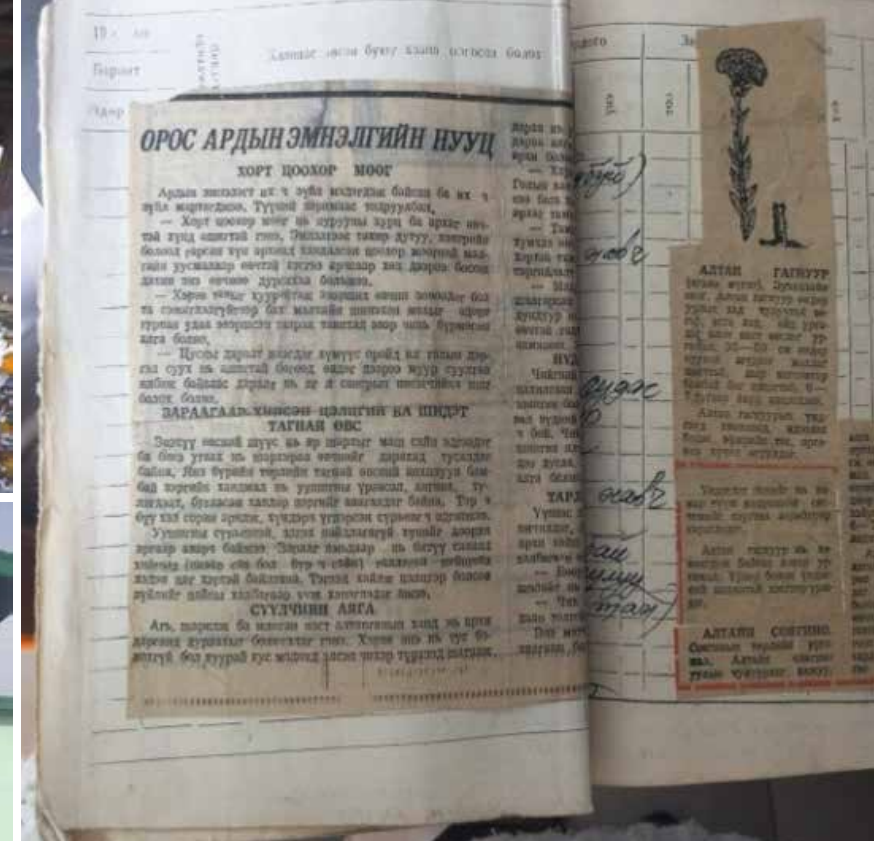
子上后，就离开去给母马挤奶了。等她回来的时候，她酿好的第一杯奶酒会倒入火中用来敬火神。在向客人敬酒时，敖特根图尔的父亲会说一些祝福的话。

用于制作马奶酒的原料不能浪费，黏贴在蒸馏设备内部的酸奶叫做“eerem”，哈姆把它们刮掉并收集在碗里，用它们提升食物的味道。发酵酸奶被倒入棉布袋，然后将变酸的牛奶(shar suu)排干。棉布袋中水分排干的发酵酸奶被制成方形，放在两块方形木板之间并用重石压住。当哈姆再次给母马挤奶回来后，压缩的发酵酸奶被切成片，放在特制的食橱上晾干，制作凝乳。这种酸质牛奶特别利于孩子保持身体强健。天热的时候，可以用来给孩子洗澡擦身。我们参与了挤马奶的全过程。每匹母马每两个小时挤一次奶，一次能挤500克。挤奶的时候，小马驹在母马旁边，主人唱着催奶的呼唤——“gurri, gurri”。敖特根图尔说，在蒙古有些地区，未驯化的母马的一只前腿会被捆住，主人则会呼唤“boogos, boogos”。敖特根图尔家的母马都是驯服的，因此，我们陌生人挤马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在蒙古，未经主人允许，陌生人不能接近马驹围栏的禁忌，已被敖特根图尔家摒弃。

敖特根图尔家能够延续用传统方式蒸馏奶酒并制作奶制品，让我们感到非常欣喜，因为这样的牧民家庭正在不断减少。不过我们观察到，他们正在忽视制作过程中的许多传统知识和习俗，部分传统知识和处理方式正

在简化和消失，例如，他们在制作过程中会忽视一些仪式步骤，也没有使用仪式器物。又如，他们会将酸马奶装在皮囊袋里，而奶酒则盛在金属容器中，这种不遵循传统的做法可能与这个年轻的牧民家庭更加关注家庭收入和市场利润有关。我们不能因此而责怪他们，毕竟现在的消费者还能享用到传统家庭制作的奶制品已非常难得。目前，该地区正在进行大面积矿产开发以及奶制品和肉类的集约化农业运作，因此，年轻的牧民越来越少，传统奶制品制作项目的秘传知识传承和延续面临威胁，影响非遗传承的社会经济影响正在不断显现，这直接导致与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非遗实践和传承出现了简化。

好的方面是，敖特根图尔家虽然为了参与经济交易活动而选择了半定居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放牧方式。现在，他们还在牧养着从扎布汗省带来的牲畜。尽管他们从故乡远迁至此，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保持牲畜原来的品种和马匹的颜色。此外，为了提升产品的文化品质，除了放牧知识，纯种马改良知识也变得越来越有用。尽管整个夏天马驹都被拴着，而且整个蒙古在这个夏天都经历了干旱，但敖特根图尔家的马群看起来依然十分健康，因为他家的马匹是带到桦树林放养的，那里有丰沛高质的牧草。不过，桦树林也会有狼群(khangai)出没，因此他要在那里过夜，守护马群。



第 5 组 传统制药方法

几千年来，传统医学和疗法是蒙古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人认为，身体健康是大脑健康的基础。因此，与种植药用植物、制作传统药品相关的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继承与发展是让蒙古人身体健康和长寿的秘诀之一。道尔金·博维舍列夫家生产的传统药品就是一个典型范例。我们探访的这个蒙古家庭位于达尔汗乌勒省的洪格尔县，过去几十年来他家几代人一直在种植药材、制作传统药品，他们继承了在蒙古已知的能够医治上百种疾病的知识以及制药知识（Em Banh）。可以说，他家已成为一个制作传统药品的工厂基地。

道尔金·博维舍列夫出生在巴彦洪戈尔省的博格县，1990年初，他的祖父贡其格开始学习药用植物知识，开始和家人一起种植药用植物并将其用于日常生活，同时，祖父将他掌握的知识传授给了家族其他成员和孙辈。博维舍列夫的舅舅是当地寺院的一位医师，他从舅舅那里也继承了许多药用植物知识，同时，他还从他舅舅那里继承了制作药品的工具。这些工具如用羊毛或马鬃制作的过滤器、用山羊皮制作的保护药材的袋子和量秤，都有着百年历史。博维舍列夫的妻子布得苏仁是一位有着34年专业经历的药师，她在药学领域的经验使得夫妻二人成为完美的组合。他们有五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坦加拉格毕业于达尔汗乌勒省的国立医科大学，专业是内科。另一个女儿也是一名药师。其他女儿和13个孙辈也参与家族的传统药品制作。他家四代一直传承着传统药品制作的知识。

目前，蒙古仅有两家私人传统制药工厂，一个是博维舍列夫家开设的，位于达尔汗乌勒省的Amgalan-Zaya（这个名字是为博维舍列夫的长孙Bat-Amgalan在五岁时起的，意为“平安幸运”，现已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另一个是乌布苏省的Mumiye。博维舍列夫家的药厂原料取用蒙古本地生长的34种不同药材制作，是纯天然的环保药品。在经中央实验室的分析检测后，由专业监管部门批准，在蒙古18个地区和首都乌兰巴托销售。工厂于2005年开始运营，当时只有4名员工，如今员工人数已增至14人。

博维舍列夫将药材分装在托盘和麻袋中晾晒，这些托盘和麻袋都放置在一座木屋中。他还在自家的花园种植野生药材和浆果，这样这些野生植物就不会绝种了。他的工厂规模不大，大部分工人都去山里采集药材。之前药材都是手工加工，博维舍列夫的舅舅还传给他一套研钵和杵捣，现在他的工厂采用机器加工。他们向国家实验室提供药品样品供其进行质量认证。蒙古现在有54家药房销售他家工厂的药品。Borolzgono草茶是他家的品牌产品，这种茶可以提高免疫力，治疗骨质疏松、关节病和胃肠伤口，还可防止内脏出血，预防前列腺癌。蒙古人消化系统紊乱的发病人数居世界第四，而许多患者都通过服用他家的药品得以治愈。

尽管药厂目前已生产了许多惠及大众健康的药品，但是，由于工作进度、媒体渠道以及与大众媒体合作等方面的限制，他们在向大众普及和推广传统医药知识的努力方面做得明显不够。乌兰巴托一所大学的15名学生来药厂做田野调查时，标准监管办公室实施了限制措施，需要博维舍列夫提供教学和行医资质。另外，同领域的其它企业也对他们的销售产生了负面影响。一家大型制药公司试图阻止博维舍列夫家销售自制的草茶；一些竞争者把博维舍列夫工厂的商品标签贴在其它药品上，利用他的品牌声誉牟利；还有一些人从他的工厂购货，然后重新包装销售。非法采摘药材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现在，蒙古制药行业普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缺乏政府和资金的支持，博维舍列夫的药厂就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他们曾经提交过1亿图格里克的预算申请项目方案，但是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积极反馈。博维舍列夫表示，现在，蒙古传统医药行业还没有制定新的国家标准，也没有与医保体系挂钩，急需制定新的国家药品生产标准，以满足药品专利申请等需求。只有做到这些，才有可能为采用传统疗法的医院提供药品，进而向国际市场出口药品，这对于蒙古的医疗行业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他还认为，卫生部应当给使用传统药品的病患打折优惠，呼吁用传统植物药品替代化学药品。

“在蒙古，我们以成吉思汗为骄傲，但是，蒙古还有很多珍贵的遗产应该值得我们骄傲，比如传统草药。”博维舍列夫介绍说，每种植物都有各自的特点，例如，一种名为Ervgjer jiregver的植物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湿气并将其渗入土壤，以防止干旱；而名为Ilden iguushin的植物可止血和治愈伤口，但这种植物一旦暴露在阳光下，会很快变黑、干枯，失去治愈功效。因此，避免采集的药材变干枯的技术在传统制药过程中极为重要。1公斤植物仅能出产200克药品，这表明，制作大众所需的成品药需要花费大量的工作和努力，这也是传统制药能够在今天艰难存活的珍贵之处。由于环境变化，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耐心对药材进行深入了解了，意识到这点，最近，博维舍列夫开始研究蒙古达尔汗乌勒省和色楞格省的植物的品种以及植物资源，他还在自家院子种植了10多种植物，如伏牛花、沙棘、车前草、蔷薇、双刺茶藨子、山楂、茜芹等。未来，博维舍列夫计划和两位大夫一起周游蒙古，调研蒙古各地的药用植物。同时，博维舍列夫正在计划筹备出版一本著作，内容是关于他自开始学习药用植物以来对传统药品命名、制药技术发展以及传统医学研究的个人笔记整理。

(沈策 整理)

新闻工作者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

格拉里得
时任蒙古国家记者协会主席

我今年已经五十岁了，我人生中的 16 年都与我的家乡紧密相连。我出生在戈壁阿尔泰省的布嘎特乡，这个地方距离首都乌兰巴托 1200 公里，是蒙古西部边境最古老的聚居地之一。布嘎特是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任何新鲜事物和变革总是比其它地区要来得晚。我的童年是在美好的时光和环境中度过的。那个时候，蒙古人还未失去他们的天性，他们从不撒谎，也不做偷盗之类坏事，不管认识与否，每个人都乐于帮助他人。例如，1970 年代末，蒙古的农村家庭开始在他们的蒙古包外支起了栅栏，尽管如此，他们从不给大门上锁，有些人只是用绳子把门栓上而已。事实是，如果用绳子栓门仅表示家中无人，并不意味着不允许进入。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是可以被允许自由进出蒙古包的。今天，生活在蒙古农村地区的人们似乎依然很难适应定居的生活方式。

蒙古人习惯过极简主义式的生活。他们从不储存和收集超过他们用度需求的东西，每个成年人都只做生活中必需的事情。每个女人都会缝衣做饭，每个男人都能包揽蒙古包外的各种劳作，年长的人会依据年轻人的兴趣，传授他们知识技艺和实践经验。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应与大家分享，这在蒙古是个不成文的规定。有唱歌天赋的孩子被教授民间长调和短调；有缝纫和刺绣天赋的孩子被传授手工技艺；对传颂感兴趣的孩子有专人传授蒙古民间颂歌；老人通过对孩子禀赋和个性的观察，能够发现未来可以成为摔跤手的好苗子并教授他们摔跤技巧。因为我长得比较高大，年长的蒙古传统摔跤传承人甚至试图传授我摔跤技巧，不过在我与其他孩子进行过较量后，他们放弃了，因为我没有能够准确掌握“宗师们”所传授的摔跤技巧。的确，蒙古人的一贯传统就是学习和传承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实践。例如，如何搭建和拆除蒙古包，如何在骆驼背上装货，如何在不伤到马匹的前提下骑马，如何进行圣地与河流崇拜，如何用皮革制作马具，如何捆羊毛，如何为骆驼鼻子中穿木钉等。尽管我们居住的乡村人口稀少，但村子里从不缺乏铁匠、木匠、信仰治疗师、脊椎按摩师、猎人、耕农、放牧人、故事大王、吟诵者、民间歌者等有各种手艺的民间奇人，这些必备的生活知识和技能在历史的岁月里代代相传。

从我 16 岁从乡村初中毕业，离开家乡继续求学，至今已快 40 年了。这期间，我在蒙古和国外都学习过，然后结婚成家，最后选择在乌兰巴托定居。因为我一直

按照现代定居方式生活，我已经忘记了儿时从长辈那里学到的大部分经验和实践。虽然我会自己搭建蒙古包，不过真要是干起活来我一定会狼狈不堪的；如果让我赶马或从一匹马背上换到另一匹马背上，我一定会不知所措；如果让我给十头骆驼装货，我肯定干不了。现在，我甚至开始忘记在蒙古传统生活中所使用的术语和词汇的传统叫法了，而忘记叫法就意味着我正在失去与游牧生活方式的联系，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已经丧失了向我的孩子传承这些传统知识和实践的能力。试想，不知道有多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流失，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由于对生活的要求和条件发生了改变，我们正与传统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游牧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这实在令人痛心。

我的堂兄是个非常优秀的民间歌者，他对蒙古的传统习俗非常精通。他总是受邀参加与相亲有关的仪式，也被邀请主持婚礼。当年，年长的传承人把他带到传统婚礼仪式现场，向他传授与仪式和习俗相关的传统知识和实践。虽然他也曾向年轻人传承了他的知识和实践，不过他去世较早，所以他掌握的那些传统习俗、文化和歌唱技艺也随着他的去世而流失。堂兄的英年早逝让我认识到，传承了千百年并承载了重要文化价值的非遗是会因非遗传承人的去世而瞬间流失。

在我的家乡，民间长调的演唱风格、技法或演唱方式都与巴彦巴塔尔和蒙古西部其它地区有所不同，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事实上，因地理位置原因，蒙古各地在演唱风格和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小时候，我曾听到一些优秀歌者抱怨说，“住在山区和住在河谷的家庭彼此通婚，但他们的演唱方式却总不能统一。”我也听说，虽然当地人现在还会演唱乡村歌曲，但却不再演唱关于家乡的传统歌曲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在改变。因此，在传统的演唱方式濒临消亡之前对其进行恰当的保护和传承，至关重要。我相信，这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礼物，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所在。

蒙古地域辽阔，这为我们准确地了解哪些地区和哪种类型的传统知识和实践正在濒临消亡或者已经流失增加了难度。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类独特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流失和消亡。这不仅是蒙古的问题，世界各地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这种危险同因人类活动造成野生动物灭绝和原始生态消失的情况一样。







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重视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蒙古也同样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批准通过了《历史和文化财产保护法》。2001年，这部法律被重新修订并更名为《文化遗产保护法》，其中包含了与非遗保护相关的若干法律条款。2005年，蒙古批准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7年，又批准加入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是蒙古为响应国际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所做出的重要决定和努力。

蒙古批准加入公约只是第一步。过去几年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提高蒙古民众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至关重要，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就此而言，向公众传播相关非遗和保护信息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而只有新闻工作者和媒体机构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展这项工作并取得显著效果。如果媒体工作者，特别是专业的新闻媒体工作者没能很好地掌握诸如文化遗产概念、分类和保护的重要性等方面的系统信息和知识，那么，他们的文章和报道就不能向读者传播具有实质意义的信息，其内容也不具备科学性。因此，为新闻工作者举办有关《公约》和非遗保护的培训班，是能让更多的新闻工作者掌握足够的非遗保护知识并为他们提供正确信息的最佳途径。

而举办针对蒙古媒体从业者的能力建设培训班则是践行这一保护理念的首创之举，2017年9月，亚太中心与蒙古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蒙古国家记者协会、蒙古文化遗产传播与网络协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蒙古全国委员会共同举办了本次培训班，来自蒙古各地40余名新闻工作者参加了本期培训班。

通过本次培训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虽然蒙古记者报道并撰写了大量有关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但是，在本期培训班之前，他们在这方面是缺乏足够系统的知识和信息的。能让记者们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问题，为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让记者们对这一领域产生浓厚兴趣，这才是本次培训班的意义所在。依我之见，本次培训班在以上方面都做到了。学员们在他们的后续文章和报道中表达了对本次培训班的感受：“我们非常高兴参加本次培训班，它改变了我们的思考角度，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文化事物。我们也从本次培训班中获得了重要的信息和知识，对此，我们十分高兴。”

我清楚地记得组织方提前为本次培训班设定了“提高新闻工作者实施《公约》的能力，加强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保护和宣传非遗及其传承人方面的作用、参与和贡献”的既定目标。在蒙古面对全球化和流行文化严重冲击、城市化进程加快、独特而宝贵的非遗项目急剧消亡的背景下，本期培训班提出的这一目标就显得极其重要。

在培训田野调研期间，所有学员都考察了蒙古当地的传统牧民家庭，并有机会深入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如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民间表演艺术、用传统方法预报天气、传统奶制品制作等，并通过后续文章和报道向公众介绍了田野调研期间所获得的知识。在经历了各种社会变迁和历史动荡后，蒙古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得以延续。在传统环境下与遗产传承人交流，学习他们的知识和实践并在媒体中进行报道，这在新闻工作者看来是富有成果和具有创意的重要工作。

撰写和报道非遗的文章并与受众分享相关信息，是当下的需要。新闻工作者的科学报道活动对于未来的使用者来说是更有价值的素材资料。就这一点而言，本次培训班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将更加深远。

本次培训班的第三点重要性在于，这一培训模式可以在新闻界广泛推广，让媒体工作者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其它领域的实践经验，从而更能理解他们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

蒙古国家广播公司参与文化遗产的记录

巴特巴彦尔
学员代表，蒙古国家广播公司新闻记者

过去 50 年来，我们一直在欣赏传奇的蒙古先民创造的蒙古文化杰作。对蒙古习俗、文化和历史的新闻宣传和研究始于 1967 年，那一年蒙古电视台成立并开始制作反映文化和遗产的电视节目。其中一些记录和宣传遗产与文化的作品包括：“蒙古农历新年”（Tsagaan Sar）、“益智游戏”、“驼队旋律”、“蒙古传统奶制品”和“蒙古传统”系列片之“我的人民”。这些电视节目旨在向年轻一代传承并向外国观众介绍蒙古的传统习俗。显然，在艰难的动荡岁月，我们的先辈和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实施了记录和录制其中最为重要部分的文化政策。

一些早期的电视节目显示，蒙古电视台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制作遗产和文化节目的风格和技术。这包括：“蒙古手工艺”系列纪录片，介绍了蒙古的铁艺、刺绣、首饰、绘画和传统蒙古包（yurt）的制作技艺，显示了蒙古手艺人高超的制作技法和手工技术。

“蒙古音乐”系列纪录片包括了“民间歌手”、“草原旋律”、“蒙古长调”、民间舞蹈“察察尔”（Tsatsat）、“蒙古呼麦”、“冬不拉音乐”、“命运和声”、“雨日旋律”和蒙古民歌“小黄马”（Jaahan Sharga）等。从 1967 年成立到 1991 年间，蒙古电视台制作了 16 毫米胶片型号长达 287.29 万米的电视素材，这相当于约 4000 小时的播放时长。今天，蒙古电视台制作的 30 多部遗产主题的纪录片由蒙古国家广播公司金色基金收藏。

在 1980 年代末以前，那个时代的蒙古知识分子对文化遗产的衰落一直很忧虑。因此，他们向蒙古文化部、蒙古文化工作者联合会和蒙古青年联合会提交了需要举办蒙古传统艺术节的建议。从那以后，该艺术节迄今已举办三届。

蒙古各省各县的民间人才都参与了该艺术节。传统舞蹈再次得到展示，许多被遗忘的长调歌曲得到振兴，手艺人开始探讨珍稀的蒙古传统工艺技术。我们高兴地看到，蒙古国家广播公司作为蒙古成立最早的电视台，在遗产传承得以延续，并能够以视觉呈现的方式为展示蒙古传统民俗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 年代以来，蒙古国家广播公司定期制作和播放的电视节目包括：“蒙古传统艺术节”、“我的人民”、“民间艺术”、“纯洁之花”、“宝珠”、“起源的旋律”、“黄金家族”、“蒙古智慧”和“Soyol Erdene”等。

其中，“我的人民”系列电视节目是由蒙古国家电视台在 1980 年初制作的，该节目记录了对蒙古各民族居住地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活动，旨在记录蒙古先民的生活、习俗、历史和文化遗产。该系列片共 13 集，每集 30 分钟，自 1991 年起，一直由蒙古电视台金色基金收藏保存。同时，蒙古电视台金色基金还收藏了自 1993 年以来制作播放的“宝珠”电视系列片，系列片共 15 集，每集 30 分钟；收藏了自 2000 年以来制作播放的“起源的旋律”电视系列片，系列片共 18 集，每集 30 分钟；收藏了自 2007 年以来制作播放的“黄金家族”电视系列片，系列片共 13 集，每集 30 分钟；收藏了自 2004 年以来制作播放的“蒙古智慧”电视系列片，系列片共 11 集，每集 30 分钟；收藏了自 2015 年以来制作播放的“游牧遗产”电视系列片，系列片共 15 集，每集 30 分钟。

蒙古受欢迎的智力竞猜游戏节目“四难”的内容涉及了传统和遗产知识。这一蒙古首个文化和遗产类知识竞猜节目是由导演巴德拉克发起的，该节目旨在寻找了解、继承并传承蒙古文化遗产的人们。

上述电视系列节目总共约 200 集，旨在向观众宣传介绍诸如蒙古传统手工艺品、技艺、审美价值、知识、宗教、民俗、文学、历史古迹和建筑等体现蒙古智慧和技艺的文化遗产。

1980 年以来，蒙古国家广播公司的文化遗产节目不仅研究、推广、记录和收藏了有关蒙古的国家历史和文化，为现代文化遗产电视节目制作奠定了基础，而且提高了人民对蒙古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2006 年 2 月 15 日，蒙古电视台更名为蒙古国家公共电视台（蒙古国家广播公司），并且，蒙古政府通过了历史文化类电视节目发展政策的有关法律。例如，《公共广播和电视法》第 8 条规定：尊重民族文化、艺术、历史、传统和习俗，将民族团结置于优先地位并促进环境保护（8.2.3.）；努力满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等社会团体和社群的需求（8.2.7.）。

自 2012 年 10 月 29 日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蒙古国家广播公司连续三年制作了文化遗产主题类的电视节目，其中涉及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各民族习俗和传统、濒危文化遗产、少数民族语言记录等，同时用哈萨克语、图瓦语和布里亚特语播报新



闻等。此外，蒙古国家广播公司一台还成立了“历史和遗产”办公室。“历史和遗产”办公室制作的节目包括：“母亲的遗产”——记录蒙古各地文化遗产的记录片；“蒙古文化和遗产”——一档现场直播节目，每月在公共电视网络播放 2 次，每次 50 分钟，该节目内容将传承人、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遗产和文化的历史与价值，还有“纯洁之花”、蒙古英雄史诗系列节目“上天的伟大画卷”以及首次以电视节目形式播放的史诗“伟大的蒙古遗产”等系列电视节目。

蒙古国家广播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光荣地履行其使命，尊重蒙古各民族文化、艺术、历史、传统和习俗，在法律的保障下将民族团结置于优先地位，不断制作有关蒙古文化遗产和传统的电视节目。1990 年代以来，蒙古国家广播公司成立并发展了金色基金，加强了收藏和保存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蒙古电视节目的工作。至 2017 年，金色基金共收藏了 30 万分钟的电视节目，其中 20% 的电视节目与文化遗产有关。金色基金档案库保存的电视节目和纪录片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取得的有价值的信息数据，是制作文化遗产电视节目、推广和传承蒙古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数据信息来源。今天，制作文化遗产类电视节目同时需要突出遗产的本质并展示其历史渊源，并且，涉及文化和遗产类的电视节目应建立在科学研究和事实基础之上并提供准确的认知和审美信息，这是至关重要的。



蒙古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扎尔嘎勒赛汗·纳桑扎尔嘎勒

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登记和研究部非遗专家

历史上，蒙古各个游牧民族一直以来都在用各种不同方式，在家庭、部落和国家层面上保存和保护着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蒙古人在育儿、保持信仰与习俗、与自然和家畜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一直保存着践行祖先知识教诲的悠久历史传统，并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使自己的土地得到很好保护并将其代代相传。

公元 16 世纪至 20 世纪，古代匈奴帝国的传统、习俗、节庆和集会，特别是大蒙古国时期的呼拉尔及相关习俗，蒙古帝国时期的国家大呼拉尔，宗教仪式，学徒训练，皇宫和寺院内的图书馆，在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蒙古国家遗产和文化方面的保存与保护上扮演了主要角色。

自 20 世纪初以来，蒙古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国家政策，文化活动与国家政策、国际标准协调一致。目前，蒙古有 820 多个文化机构，43 个博物馆、1500 个图书馆、342 个文化中心、20 多个电影公司以及 40 多个与艺术相关的专业机构。同时，140 余个寺院，私营影院，出版机构，艺术工作室，展览馆，马戏团、众多中小型手工艺品制作工厂，商业实体以及文化艺术类的非政府组织都参与到了蒙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

今天，蒙古人口由 24 个民族构成，包括喀尔喀人、布里亚特人、哈密尼干人、达尔扈特人、巴牙惕人、厄鲁特人、土尔扈特人、扎哈沁人、明嘎特人、达克哈德人、阿尔泰—乌梁海人、巴尔虎人、乌宗奇人、达里冈崖人、和屯人、查坦人、和托辉特人、萨图人、图瓦人以及哈萨克人等。

蒙古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有着各自丰富多彩的历史，它们在历史中不断演进，奠定了自身民族独特的文化重要性。蒙古每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都为蒙古整个民族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千百年来，蒙古独特的游牧文化在各个不同层面都保存了它的根脉，它是蒙古民族文化遗产遗存至今的核心与基石。它是世界上一种独有的牧场畜牧传统，这种传统在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体现出了独特的游牧生活和文化方式。最重要的是，这是蒙古游牧生活的传统形式，包括与蒙古国家传统相关的关于宇宙的知识，与土地、天空和环境和谐相处的理念与生活哲学。抽象层面的传统习俗、道德准则、审美方式、口头传统和文学、史诗、颂歌、民间音乐、传统舞蹈以及具体层面的，那达慕大会、马头琴、呼麦等蒙古人所有的物质和思想文化价值均来源于此。

蒙古于 1990 年批准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05 年批准加入了 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7 年批准加入了 2005 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并开始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它有关国际组织开展合作。截至到 2017 年，蒙古共有 4 项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包括 1 项自然遗产、2 项文化遗产和 1 项自然文化混合遗产；7 个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7 个非遗项目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 项文献遗产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上述总计 23 项遗产正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得到保护和推广。

2014 年，蒙古国议会通过了《文化遗产保护法》（修订版）和《图书馆法》，2015 年通过了《蒙古语言法》。这为建立蒙古非遗保护的法治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蒙古还通过并实施了针对非遗保护的总统令、政府令以及配套项目。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界定，蒙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大类别，相关保护、研究和推广计划也按此分类相应地开展。这五大类别包括：



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遗传播媒介的语言

口头传统包含口头诗歌、民间传说、神话、歌曲、谚语、咒语、符咒、宗教知识以及关于过去的叙事等，口头叙事文学传统是通过说书人和游吟诗人的歌曲和故事世代传承文化信息的一种方式。

在蒙古这一类别包括诸多遗产，如各种仪式音乐和歌曲、诗歌、谜语、谚语、神话、祝福、颂歌和名号，而这一类别中的蒙古语言和文字则占据了主要地位。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族，蒙古语包括各种方言，诸如蒙古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裕固语、达古尔语、卡尔梅克语、卫拉特语、布尔亚特语、中部方言、南部方言等。蒙古人用他们的母语创造了无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可以说，蒙古语是一座无尽的宝库，它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承载了蒙古民族的各种思想，如口头散文文学、民间传说、传统艺术和习俗。蒙古文字则包含上百万个词汇，蒙古口头方言多达 300 万个词汇。根据学者的研究，蒙古语中有 300 多个描绘家畜的词汇，400 多个命名家畜身体各部位和器官的词汇，160 个辨别家畜年龄的词汇，超过 30 多个形容牧马人的词汇，以及 100 多个描述动物种类的词汇。《蒙古人密史》《格斯尔》《江格尔》《汗哈冉惠传》等蒙古文字写就的伟大文学作品举世闻名。历史上，蒙古语曾将欧亚两个大陆连接在一起，今天，蒙古语是蒙古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中国和俄罗斯均生活着说蒙古语的人们，世界各地有超过 500 万人以蒙古语作为交流的主要语言。制定并实施政策以确保对蒙古语及其读写能力的掌握、使用和保护，这是国家的责任。每个蒙古公民都有权获得掌握蒙古语及其读写能力的学习条件和机会，学习蒙古语，继承、传承、保护和发展蒙古语。

蒙古文是蒙古人从公元 13 世纪至 1950 年间（长达 750 多年）一直使用的一种传统和正式的书写体系。过去的蒙古文也被称为畏兀儿蒙文或旧体蒙文。19 至 20 世纪，蒙古文的语法和书写体系被确定了下来。蒙古文有不同的书写方式，如折叠式 (evkhej) 和图画式 (tatalij)，成吉思汗的石书被认为是蒙古文字的最早记录。1980 年代中期，蒙古文开始在蒙古中学阶段教授，这是向蒙古年轻一代传承传统蒙文的重要措施之一。1990 年代初，蒙古的民主运动为恢复传统蒙文提供了机会。蒙古人没有忘记蒙古的传统文字，一直在使用它并将其融入到现代蒙文体系，这是蒙古人民为世界文字和书写史做出的宝贵贡献。

2、民间表演艺术

这一类别在蒙古包括口头旋律的传统，如劝诱动物、赛马和摔跤比赛的宣示仪式、赛马骑师吟唱的歌曲、民间长调和短调、摇篮曲、传统喉音唱法（呼麦）、口哨、传统器乐艺术（如口弦琴、马头琴、潮尔和笛子）以及传统舞蹈艺术（如萨吾尔登、柔术、查玛舞、游戏和武术等搏斗技巧）等。

上述每一种表演艺术门类又可细分为各种不同的子项，例如，劝诱绵羊 (toiglokh) 接受小羊羔，与劝诱山羊 (cheeglekh) 所发出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又比如，劝诱骆驼接受新生幼崽或幼崽孤儿时，需要采用歌唱和吟唱的方式，再辅以弦琴、笛子和潮尔等乐器进行。劝诱骆驼时，先对它唱歌，如果这个办法不奏效，就弹奏乐器，参与并实施这一仪式的都是那些有演唱和音乐技艺天赋的人；还有，吹口哨的技巧又分为三种：用牙齿吹哨、嘴唇吹哨和上颚吹哨；蒙古民间长调可分为大长调、长调和小长调；呼麦的种类也很多，如 isgeree、whistle、shakhaa、kharkhira 等。

蒙古民间表演艺术极具特色，里面包含并融合了蒙古众多民族的文化表现形式。例如，传统舞蹈萨吾尔登 (Bii bielgee) 就是一种独特的表演形式，它通过肢体动作和传统服饰，展现了蒙古民族历史、习俗、仪式、传统、游戏、情感、精神、劳作和游牧生活。



3. 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

包含拴系放牧、牲畜烙印仪式、剪羊毛、制作毛毡、农耕、圣地崇拜、问候传统、给孩子起名和受洗的习俗、婚礼仪式、蒙古包暖房聚会以及丧葬活动等蒙古各民族的社会实践和仪式体现出他们所属社区和社群的心理和思想，也是蒙古社会长期遵循的社交传统和指导社群关系的历史规范。学习和研究蒙古各民族的仪式和习俗，用现代内容和形式丰富它们，并在现代生活中进行实践是当下的重要课题。

蒙古的民族节日如那达慕大会是按照既定程序进行的传统和仪式。值得一提的相关非遗项目包括：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蒙古传统节日那达慕”，还有蒙古春节“查干萨日”（Tsagaan Sar）、“成吉思汗诞辰纪念日—蒙古民族自豪的日子”、蒙古独立/宪法日、骆驼牧民日等。

4. 传统技术、知识以及涉及自然和宇宙的实践

游牧的蒙古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即自古以来就崇拜天地并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与自然、季节和游牧生活相关的传统知识和实践一直在不断积累。例如，传统奶制品知识和制作技艺、传统医学、传统兽医、崇拜、度量衡、占星术、传统农耕方法等知识和技艺均得到了发展。

一旦生病，蒙古的传统医学强调使用各种民间疗法进行治愈，里面涉及了针刺和放血、烧灼治疗、针灸、按摩和其他非传统的方法，每种疗法都有其独特方式。在欧亚大陆腹地严酷的气候条件下，蒙古人在各地迁徙放牧的过程中，发明并实践了各种传统医学形式和治疗各种疾病的疗法。同时，他们还探索并掌握了其他方面的知识，例如，以12年为周期进行纪年、从蒙古包屋顶（toono）来观察太阳运行进行每日时间计算以及许多气象学方面的知识等。



5、传统手工技艺

游牧的蒙古人的传统手工技艺完全基于从他们所属区域及部落放牧的牲畜那里获得的原材料，这与他们的生活需求和审美要求紧密相连。

蒙古传统手工艺品的种类包括纺织刺绣、皮革制品、骨雕、角雕、牙雕、木雕、雕塑、纸作技艺、蒙古传统书籍制作、金属锻造、蒙古传统装饰、蒙古书法等。其中，一批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是19世纪绣工制作的镶边缝花刺绣品，现保存于扎纳巴扎尔美术馆。这些绣品尺寸巨大，其中“Jalavsangin Ra”有16米长、10.5米宽；“Ochirvaani”有14.5米长、11.2米宽；“White Tara”和“Ayush”均为14米长、10米宽。

包括蒙古传统服饰制作、蒙古包建造、银器铸造、铁艺雕刻、木雕和马具制作等手工技艺，自古以来一直在发展和传承。随着现代技术的使用，制作民族手工艺品所花的时间大为缩短，而其内容和形式则不断丰富。

蒙古文化部下属的国家文化遗产中心负责蒙古文化遗产的登记、宣传和保护。作为一个文化和科学机构，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负责国家文化遗产登记和信息综合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对纳入数据库的文化遗产进行登记，对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和技术进行推广、保存、研究、传承、修复、发展和实施，并为文化遗产机构和博物馆提供保护方法。而文化遗产机构的登记和信息数据库均设在当地机构内，例如，各省的登记和信息数据库设在当地博物馆，各县区的登记和信息数据库设在各个文化中心。

文化遗产登记和信息数据库包含保存文化遗产所需的全部信息，以防遗产遭到损坏、破坏或遗失。截至2017年，8000名非遗传承人的注册信息、316个小时的录音资料、1050个小时的录像资料、850首歌曲、录像节目、照片以及其它与非遗相关的电影、书籍和手册记录信息均已被录入国家文化遗产登记和信息综合数据库。

根据蒙古2014年修订的《文化遗产保护法》条款，中央和地方层面的相关机构有必要制定和实施中长期规划和项目。其中，第26.1条规定：中央政府负责文化事务的行政主管部门将与首都及各省的行政首长共同组织每三年开展一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活动，每五年开展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活动，每四年开展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活动；第39.1条规定：中央政府负责文化事务的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官员应负责与本民族历史传统、习俗和生活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保存、保护、传承、推广和研究；第39.2条规定：中央政府负责文化事务的行政主管部门应每三年组织一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旨在保护、促进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认定和表彰非遗传承人；第39.3条规定：各级政府官员应组织学徒训练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对本次培训班的感受

蒙贡图雅

学员代表，蒙古鄂尔浑省《额尔登特时报通讯》记者

之前，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很了解，不过，自从我参加了在达尔汗－乌勒省举办的培训班后，我学到了许多与非遗相关的内容。现在，我确切地发现，非遗的确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在蒙古，表现传统习俗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非遗项目有很多，它们都与蒙古人传统而独特的生活技能紧密相关。

培训期间，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之前的许多媒体工作实际上都与非遗有关。例如，我们曾对蒙古的传统节日进行过报道，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撰写和报道的是非遗活动。“查干萨日”（Tsagaan Sar）是蒙古的传统节日，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它象征春天的到来、家畜幼崽的降生、漫长严酷冬季的结束以及雪莲花的生长。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与父母和兄弟姐妹聚会，用丰盛的酒肉来庆祝这一节日。据史书古籍记载，早在 2000 多年前的匈奴时代，蒙古人就开始庆祝这一节日。当时，这一节日还被称作“奶制品节”，人们会在每年牛羊膘肥、五谷丰登的秋分时节庆祝。1205 年冬季最后一个月和春季第一个月之际，铁木真被授予“成吉思汗”尊号，成为蒙古帝国大汗。从此以后，蒙古帝国成立的庆祝日就与上述节日放在同一天庆祝。此外，根据其它东方国家一般选择在春季庆祝春节的共同传统，“查干萨日”的庆祝时间也从秋分改为春季，至今这个传统依然在延续。

在我们的生活中，非遗有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对这些表现形式进行报道，但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种报道是在宣传非遗，而只是认为我们在宣传个人。参加了此次培训之后，我意识到我们并没有为相关的非遗报道进行分类，也没有为它们统一命名。现在，我想到的是，应该给这一系列报道文章赋予一个概括式的主题和名称。例如，我工作的电视台首次为蒙古的乡村儿童制作了一部电视剧，名叫“生活如梦”，共 12 集，每集 25 分钟。这部电视剧的亮点在于，它以儿童为切入点，展示了蒙古人在现代生活中如何用传统方式生活。而与传统生活方式相关的非遗内容也贯穿全剧始终，所以，我认为这部电视剧同时也在宣传非遗。因此，我的想法是，如果在电视剧每集开头或结尾用非遗的概念作为主题，效果应该会更好。

通过学习《公约》及其业务指南的相关专业知识，直观地说，不但让我学会了如何区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原来媒体工作者在《公约》的实施方面可以发挥如此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我们也真实地感受到，非遗是个无尽的话题，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撰写很多相关文章和新闻报道，也可以制作很多电视节目。在此，我谨向举办本次培训班的组织者以及培训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做连接非遗与公众的桥梁

——“亚太中心”首个媒体从业者“履约”能力建设培训班侧记

薛帅
《中国文化报》社采访中心副主任

媒体在非遗保护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已是共识。从我国的非遗保护进程中不难发现，社会公众非遗保护意识的提高，离不开多年来媒体的鼓与呼。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简称“亚太中心”）针对蒙古国媒体从业人员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履约能力建设培训班在蒙古国达尔汗乌勒省举办。

“这是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首次举办专业领域主题培训，也是首次在蒙古国举办培训活动。”亚太中心主任梁斌说。

媒体亟须提升非遗“实力”

“蒙古国媒体目前没有专业从事非遗报道的记者，由于媒体重视不够，蒙古国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忽视，很多非遗种类亟须抢救。”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文化艺术政策司司长包尔得坦言，一直希望能有国际力量针对本国需求，对媒体从业者举办非遗领域的能力建设培训。“这将有助于提高蒙古国公众和社会对于非遗保护的认识，让蒙古国的非遗保护理念与意识与世界接轨。”

“之前从没有对媒体人进行过非遗领域能力建设的相关培训，对于我来说也是首次。”参与此次培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培训师拉胡尔·高斯瓦米告诉记者，从国际层面去提升媒体人在非遗领域的作用和力量，意义重大。“媒体人是公众舆论的引导者。这一群体的知识储备、认识角度、思维观念、表达方式都影响着非遗在民众中的传播、普及与推广。”

“这是亚太中心首次尝试为某一专业领域量身打造的主题培训。”亚太中心工作人员说。据了解，本次培训班是根据2016年10月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的2016年度东北亚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域性会议上蒙古国媒体从业者提出的请求而举办的。“课程设计和培训内容经主办方和培训师多次商议形成，许多学员表示他们从去年得知举办本次培训的信息后就一直期盼参加。”蒙古国家记者协会主席格拉里得介绍，参训的42名学员经过蒙古合作方严格筛选，学员结构具有代表

性，包括了蒙古国家级媒体和21个省的省级媒体代表，涵盖了电视媒体、纸媒和网络媒体，基本能够代表蒙古国境内各类媒体的从业人员。

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思考

一望无际的蒙古高原孕育了诸多绚烂夺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蒙古族长调、呼麦、马头琴制作及表演技艺到蒙古医药、蒙古那达慕……这些非遗资源滋养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游牧民族。“我们这一代的蒙古青年人如今很多离开了牧区，选择在城市生活，离本民族的非遗越来越远。”本次培训的学员、在蒙古国一家全国性电视台工作的记者娜仁托娅说，“这种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层面的。”

的确，非遗离现代人生活越来越远，这一全球性的话题，在蒙古国这种从游牧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化建设转换的国家更加凸显，所经受的考验与挑战也更加严峻。据统计，蒙古国有近2/3的人口已聚集在乌兰巴托、达尔汗等大城市生活。“所以我们在蒙古国的日常新闻中，能更多地覆盖并涉及对非遗的报道与传播。”蒙古国文化遗产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部负责人莎若拉说。

本次培训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培训师授课，介绍了《公约》的基本概念、非遗保护有关知识及其伦理原则和责任等内容，并分组进行了5个非遗项目的田野调查采访练习。我还被邀请进行了实例分享，介绍中国媒体在非遗保护领域宣传报道的经验和实践，并与蒙古国媒体代表深入交流探讨了非遗保护领域新闻报道的经验。

培训中，学员们在课堂上的积极参与和激烈讨论，给培训师亚历山德拉·丹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对本民族非遗怀着极深的感情，又非常渴望了解到其他国家非遗保护的先进经验。对于同一问题有着多角度的思考与评价。”亚历山德拉·丹尼斯用“Critical”（批判性的）一词来形容蒙古国媒体人的“实力”。“这是我在很多国家很少见到的。这是属于媒体人特有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从他们身上我们反观到媒体在非遗保护中所承担的责任之重大、角色之重要。”



媒体发挥力量 提升公众非遗保护意识

在分组田野调查中，学员将所学《公约》内容及实例分享到实地采访报道练习中，呈现出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和电视短片。“非遗保护事业发展，要依靠宣传与舆论，而这些都是媒体人的看家本领。除了供给新闻产品、满足受众，发挥教育职能与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也是我们的责任。”娜仁托娅说。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从蒙古国偏远西部省份来的学员。该学员是哈萨克族，乘坐两天两夜的长途汽车，跨越近2000公里专程来参加培训。“此前虽然做过一些文化类的报道，但是对非遗保护没有明确的认识，通过本次培训，不仅了解《公约》的基本内容，更加强了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今后将在《公约》精神的指引下，在工作中更多关注本国的非遗保护事业，积极发挥媒体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他说。

“媒体在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希望本次培训能让蒙古国媒体从业人员了解《公约》知识，并在《公约》精神指引下，在各自的工作中积极发挥媒体作用，提升公众对非遗保护的认识。”梁斌说。据悉，本次培训后，蒙方提出希望亚太中心继续为蒙古国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后续培训和工作支持。而经过此次培训，亚太中心的培训活动已经覆盖亚太地区31个国家，直接受益人数872人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蒙古全委会秘书长乌雅恩噶在培训班结业式上激动地说：“这种培训模式是新的尝试。希望蒙古国媒体代表能将收获的知识传递给其他从业者。”培训中，媒体学员还提出了针对政府工作和媒体行业的建议，并表示今后将在工作中将这些建议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表达，以提高政府和公众对非遗的认识，致力于在蒙古国全境培育非遗保护观念。

原文于2017年10月9日刊登于《中国文化报》



亚太中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融合培训班”在线开班

2020年8月11日至14日，亚太中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信息和网络中心（ICHCAP）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网络（APHEN-ICH）在线合作举办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融合培训班”。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这是亚太中心首次举办多国线上培训。培训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及驻华代表处的大力支持。21名来自中国、蒙古、缅甸、印度、尼泊尔、菲律宾、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3个亚太地区国家的高校讲师、教授、项目负责人，作为学员参加了培训。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日韩亚太中心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等教育网络的10余名代表列席参加了培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培训师马克·雅各布和阿玛雷斯维尔·加拉应邀授课。

培训期间，培训师重点讲解了非遗相关课程开发问题，强调了非遗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学员通过线上主题授课、学员演讲、在线讨论、合作学习等形式，就“当前新冠疫情对非遗教学的影响”、“非遗纳入主流课程存在的问题和跨学科设置”、“保护非遗的不同方法”、“传承人和利益持有者网络设置标准”、“非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培养”、“本地语言与促进非遗保护”、“高学历教育的学术学习与案例研究”等议题展开了学习与讨论，并对进一步开发“亚太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通用（保护非遗）教学框架”的需求和挑战做了充分交流。

网络与线上教学成为本次讨论的热点，学员们就当下疫情的状况，积极介绍了亚太地区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需求，深入讨论了构建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框架的必要性以及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建议搭建一个在教学中可以使用的“工具箱”，设立“开放式基金”框架，以帮助高等教育项目毕业生在非遗保护领域开展工作和建立“开放式阅读框架（ORF）”，以对高等教育课程产生互动影响等方面形成共识。

中日韩亚太中心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等教育网络还结合当下亚太地区非遗保护能力建设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合作需求等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此次培训是继2019年7月后，中韩亚太中心再次合作作为亚太地区高校网络举办的第二期《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培训，四分之三的参训学员是第二次接受《公约》框架下的培训，参训学员和课程设置具有较强的延续性。本次有来自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大学的4名老师参训。其中，上海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是在亚太中心的积极推荐下，于去年首次参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等教育网络相关培训。后经亚太中心的协助，上海大学于2019年下半年正式加入该网络，成为第一个加入该网络的中国内地高校。现亚太中心从高校网络秘书处得知，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已提交申请，将成为该网络正式成员，近期将完成后续相关手续。

培训期间，以上两所大学的参训学员积极参与课堂发言和讨论，向大家介绍中国“非遗进校园”、中国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以及所在高校非遗教育的相关经验，使大家对非遗保护与教育的融合有了深入的认识，并对中国在文化遗产教育领域所做的努力表示称赞。此外，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对亚太中心在其开展的“亚太地区中小学非遗教育调查”中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中国的案例极大丰富了该项目的研究，为亚太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今年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亚太中心在各会员国组织现场培训受到极大限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和提倡利用网络渠道开展非遗保护及其能力建设，以保障非遗实践、培训等相关活动不间断。亚太中心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及时将现场培训转为线上培训。

线上培训不同于现场培训，需提前充分考虑参训学员所在地的通讯、网络、时差等因素。在制定培训计划时，亚太中心多次与韩国亚太中心召开线上会议，对平台选择、整体课程时长、单节课时设置、主题内容安排、课堂气氛调动等方面做详细讨论，以保证科学、有效地开展培训。中心工作组十分重视对网络平台的使用，培训前3个月对当下热门的网络平台开展调研，在其功能、性能、辐射范围等方面反复做比较，争取保证使每一位学员在参训时网络顺畅、操作便捷。

在培训过程中，工作组与合作方、培训师保持即时沟通，时刻关注培训现场效果，提出调整建议。培训师阿玛雷斯维尔·加拉先生认为，“组织线上培训比现场培训更难，本次培训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也代表着亚太地区非遗能力建设培训正在走向成熟，期待未来亚太中心能够组织更多的线上培训。”

亚太中心业务动态

亚太中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融合培训班”在线开班
第四期中亚师资培训班在线举办

第四期中亚师资培训班在线举办

2020年8月24日-28日，亚太中心在线举办了第四期中亚（俄语）师资培训班。培训为期5天，共有16名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4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专家、学者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和阿拉木图办事处的大力支持。

本次培训邀请到塔玛拉·妮科力克·德里克女士和艾扎金·科乔贝科娃女士担任培训师，为学员讲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框架下的相关知识。两位培训师重点结合国际援助申请和申报（特别是优秀实践名册项目申报和多国联合申报）内容，通过课堂授课、案例分析、小组作业、课堂测评等丰富的教学形式，从理论到实践，帮助学员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有效推动学员尽快完成从本国专家向教科文组织非遗培训师的角色转变。

本次培训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代表李东韵还为学员介绍了《公约》的最新进展。近两年来，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上多次讨论紧急状态下的非遗这一议题，在去年的第十四次会议上还通报了目前制定的紧急状态下非遗保护的工作原则与形式。此外，教科文组织近两年来也一直在呼吁关注非遗基金利用率严重不足、国际援助申请文本质量不高等问题。

本次培训积极响应教科文组织对这方面议题的呼吁，结合当下全球疫情爆发这一紧急状态，参训代表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对非遗存续和非遗保护工作的冲击，探讨了紧急状态下的非遗保护经验，并充分认识到非遗在全球疫情爆发这一紧急状态下所具有的双重属性：非遗的存续与实践在疫情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大部分保护工作都改为线上开展，覆盖不到网络条件差的偏远地区；非遗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遗的宣传、展示和实践有力增强了社区的恢复力和凝聚力。同时，培训还通过理论知识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模拟练习、专家经验分享等形式，让学员全面了解到国际援助申请的要求、方法和常见误区。

由于本次培训受益于现代科技，灵活性大大增强，国际专家资源力量得到很好的调动。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受邀分享了疫情在丝绸之路国家蔓延的情况。他指出，“人类不是孤立的，疫情爆发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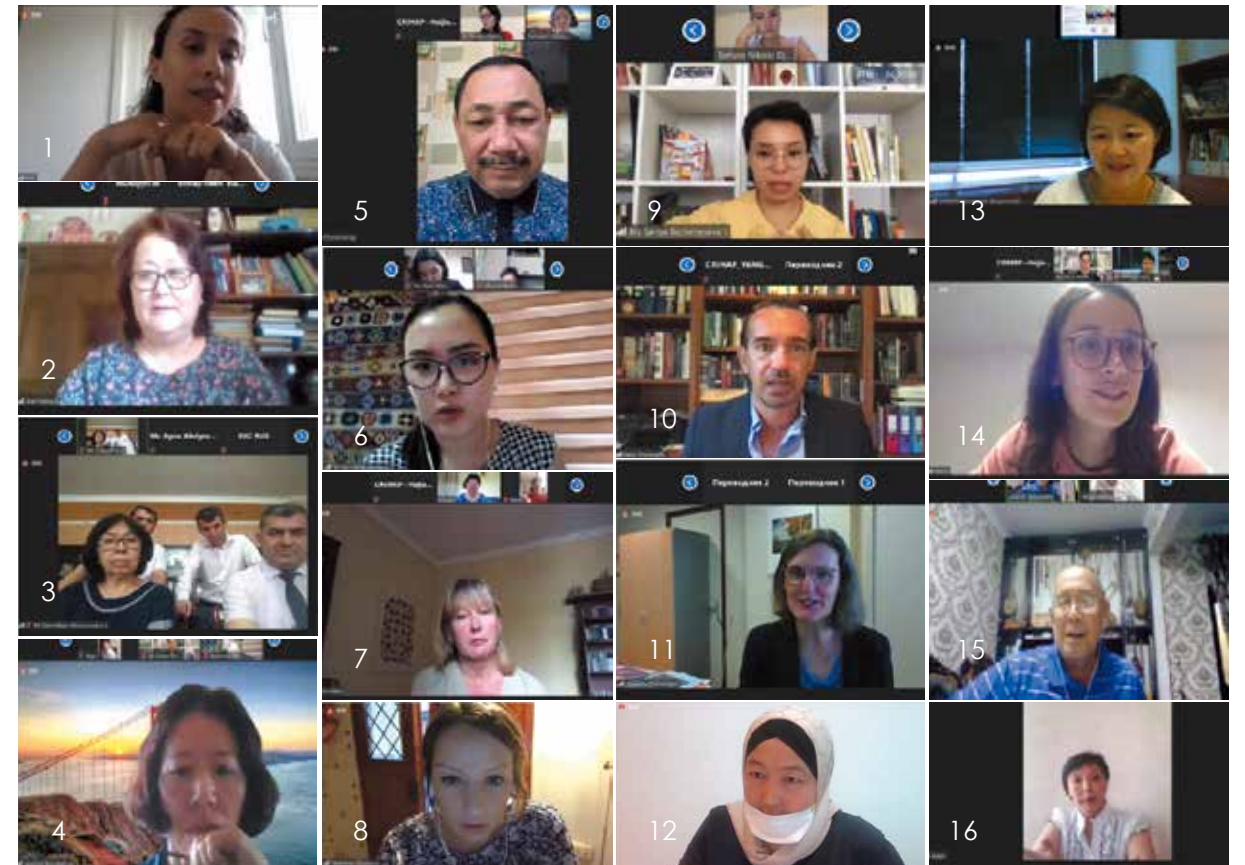
我们有机会反思对自然界的生态环境进行人为干预的后果。这一点在非遗保护中也值得思考”。塔吉克斯坦非遗专家娜德娅·扎德拉科娃受邀分享了“塔吉克斯坦非遗保护需求和优先事项评估”工作的调研评估方法，本国在非遗保护工作中面临的挑战和相关建议。阿尔巴尼亚文化部副部长兼教科文组织培训师梅丽·库姆贝女士受邀结合本国为开展非遗清单制定工作所申请的国际援助，分享了本国在项目申请阶段所做出的努力，以及项目批准后的执行情况。

三位专家分享的案例和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培训内容，也为参训代表提供了一次拓展交流的机会。塔吉克斯坦学员娜佐卡特·克利表示，“本次培训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为我们搭建了有益的平台。我们平常都只从事与本国非遗保护相关的工作，这次通过知识和经验分享，我们不仅对自己国家的非遗保护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还借鉴到其他国家的经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处能力建设部门负责人苏珊·史努特根在致辞中表示，亚太中心是教科文组织组织的重要合作伙伴，感谢亚太中心在过去三期中亚师资培训（2017年-2019年）的基础上，继续为该地区提供帮助。中亚四国通过连续的培训，在推动本国非遗保护政策制定，掌握清单制定方法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中亚地区仍将是教科文组织重点支持的区域，中亚各国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热情很高，但仍需要不同层面的能力建设支持。其中，塔吉克斯坦的非遗保护能力最为薄弱，塔吉克斯坦非遗专家娜德娅分享的“塔吉克斯坦非遗保护需求和优先事项评估”中提到，塔吉克斯坦的非遗保护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资金缺乏、非遗可见度不足等等，急需《公约》相关的能力建设培训。

塔吉克斯坦学员娜佐卡特·克利表示，“本次培训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为我们搭建了有益的平台，我们平常都只从事与本国非遗保护相关的工作，这次通过知识和经验分享，我们不仅对自己国家的非遗保护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还借鉴到其他国家的经验”。

本次培训原拟于今年3月在塔吉克斯坦举办。受疫情影响，实地培训无法按原计划进行。中心经与教科文组织总部多次沟通，并召开中心内部工作会反复商讨，及时转变工作思路，探索可能的线上培训方式。中心通过向合作方发放调查问卷了解线上培训平台情况，对比



- 1、阿尔巴尼亚文化部副部长兼教科文组织培训师梅丽·库姆贝女士分享经验
- 2、吉尔吉斯斯坦学员展示小组作业成果
- 3、塔吉克斯坦学员上课
- 4、培训师艾扎金·科乔贝科娃女士为学员授课
- 5、哈萨克斯坦学员发言
- 6、吉尔吉斯斯坦学员展示小组作业成果
-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拉木图办事处主任致开班辞
- 8、塔吉克斯坦非遗专家娜德娅·扎德拉科娃分享经验
- 9、哈萨克斯坦学员在小组讨论中发言
- 10、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分享经验
-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处能力建设部门负责人苏珊·史努特根致欢迎辞
- 12、乌兹别克斯坦学员小组练习发言
- 1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代表李东韵介绍《公约》最新进展
- 14、培训师塔玛拉·妮科力克·德里克女士授课
- 15、乌兹别克斯坦学员发言
- 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拉木图办事处文化项目官员艾古·卡拉弗娃

国内外线上平台资源等方式，最终选定支持同传功能、信号稳定、使用反馈较好的 Zoom 平台开展本期培训。为了保证线上培训效果，中心与包括教科文组织总部、阿拉木图办事处和培训师在内的工作组成员开展了多次线上筹备会，测试线上平台功能，商定培训课程时间安排、具体内容和开展形式，确保学员在线学习负荷不过量，提高学员参与度，及时掌握学员对知识的消化程度。整体培训活动开展得顺畅、活跃。教科文组织总部代表李东韵表示，“很开心能参与到小组讨论中，小组里大家积极互动的氛围让我很受触动。”

通过接受四期连续的，涉及《公约》不同主题的培训，中亚学员基本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公约》框架下的知识体系，为尽快从本地非遗专家、学者转化为教科文组织非遗培训师，进一步在中亚地区甚至其他地区传播《公约》知识奠定了基础。

CRIHAP Newsletter



亚太中心网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编印

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来广营西路81号 100021

电话：86-10-64966526, 86-10-64893353, 86-10-64896563

传真：86-10-64969281

网址：www.crihap.cn

邮箱：crihap@crihap.cn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CRIHAP

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re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